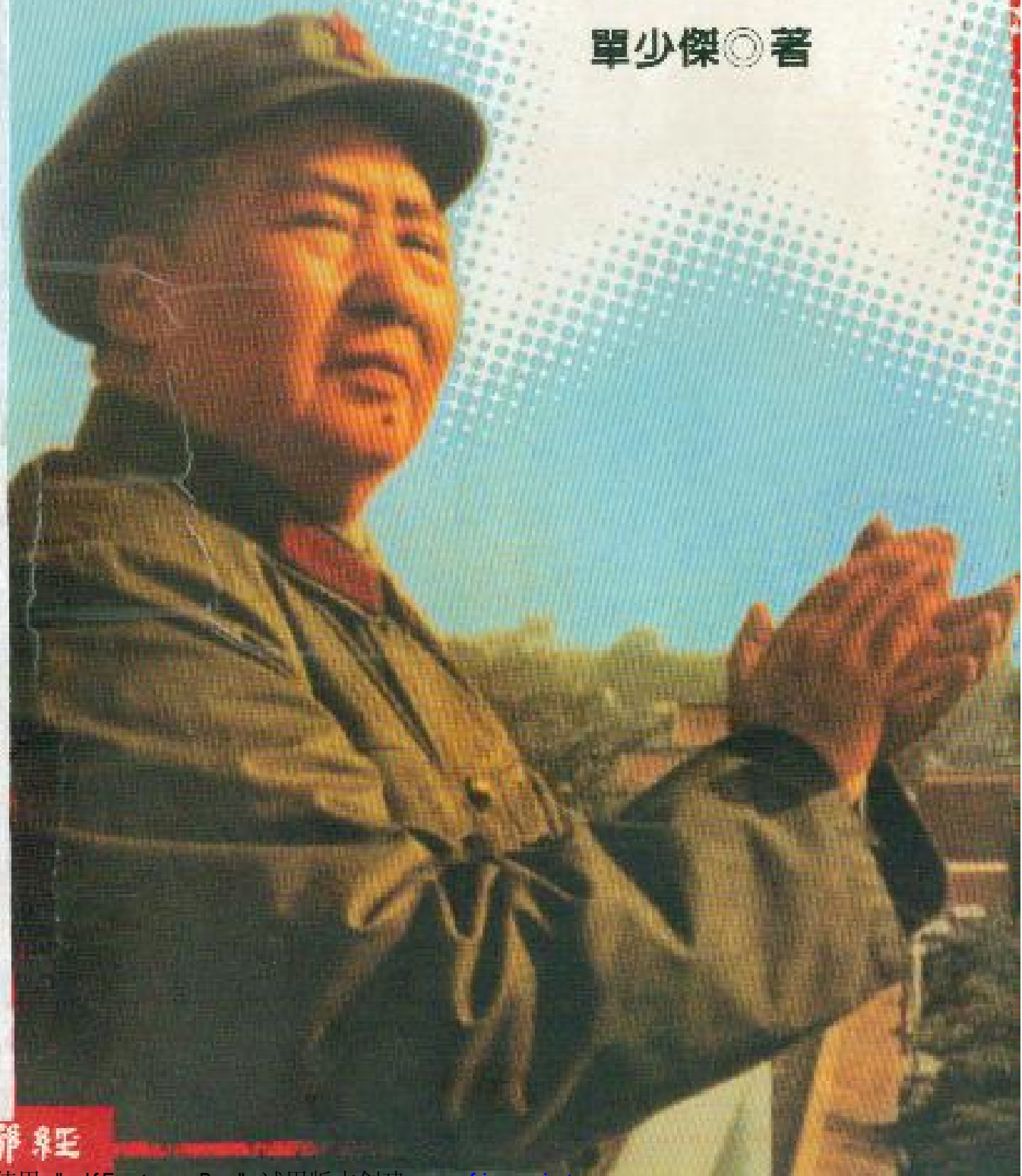


文化叢刊

# 毛澤東執政春秋

單少傑◎著



聯經

## 序一

在〈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初探〉一文中，我曾談到，1981年通過的〈歷史決議〉「不是對毛澤東研究的終結，而是研究的真正開始。在毛澤東研究中，過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動和思想(主要是晚年的「左」的錯誤)。這是剛剛過去的歷史。我們實事求是地回顧這段歷史，主要是爲了總結經驗教訓，前人的錯誤給我們的教益並不亞於他們的成就給我們的教益。」這是十年前說的話，沒有聽到不同意見。

以前，人們常說，中國自1949年後進入了「毛澤東時代」。這種說法雖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卻反映了一種歷史的真實。因爲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的理論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經過艱難曲折的漫長道路，取得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他以不容拂逆的個人意志，開始社會主義建設，只爭朝夕，追求大同之境，左右了國家的一切，直到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真正做到了「繫天下安危於一身」或者誰也「跳不出如來佛手心」。我們過去的成就和失敗都同毛澤東分不開，研究他的晚年錯誤，對於我們的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自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期間，鄧小平多次談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談到「文革」十年是全局性的錯誤，其後果極其嚴重，而且一直在發生影響。當年批判「兩個凡是」時，鄧小平說過：「我們要注意，現在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認爲中央現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轉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能聽黨的話嗎？他們是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的。」果然，這種人舊習不改，尤其1989年後又大大出現了這種翻騰，

於是1992年初，鄧小平不得不「打招呼」，作南巡講話，告誡全黨上下，「左」的錯誤是根深蒂固的。所謂「根深蒂固」，當然同毛澤東晚年錯誤分不開。

1997年列席十五大時，我在書面發言〈關於防「左」的感想與意見〉中談到，在黨的七十六年歷史中，最難改的錯誤是「左」，從馬恩列斯的理論與實踐到中國自古以來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分析了「左」及其難改的根源，並建議總結改革開放廿年來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最近，在全國學習「三個代表」高潮中，鄧小平指責過的那種「左」的翻騰又出現了。「左」爺們的「左」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死抱住教條，無視歷史事實，唯我獨革，還是唱著那些老調子，還是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

因此，研究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研究毛澤東執政時期的方方面面，理清事實，探討根源，仍是不可推卸的長期任務，仍同我們當前的建設和未來的走向緊密相關。我一直認為，不徹底清理毛澤東的問題，不徹底查明前卅年（1949至1978）走過的大大小小的彎路，不徹底弄清「左」為什麼根深蒂固的全部歷史，我們就不能輕裝前進，就還會犯錯誤、走彎路。

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是條長腿，政治體制改革是條短腿，致使我們總不能大步前進。原因何在？關鍵就在我們沒有徹底清算過去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同「左」的結合。毛澤東承認自己是搞「馬克思（實為史達林）加秦始皇」；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要有點個人崇拜」；追求「君師合一」……於是才有林彪的「四個偉大」（毛本人特別欣賞「偉大導師」），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文革」十年「砸爛一切」，將人類社會歷史進步所依靠的民主、自由、科學、法治、市場經濟，統統踩在腳下，致使整個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至今回顧，仍不寒而慄。有鑒於此，1980年鄧小平作了要徹底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報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報告中講到的種種措施，二十年來未能得到認真落實。我們還是習慣人治，習慣家長制，習慣個人說了算；還是一個權大於法的權力社會，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法治社會；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乃至執法犯法的現象，仍普遍存在。這就是腐敗難治、民意難申、言路阻塞、黨的威

信日益下降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是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歷史人物，也是世界有影響的人物。有關他的傳記，國內外已出了多種，最近西方又出了兩種。據說拿破崙身後的傳記有一百多種。相信毛澤東的傳記也會越來越多。出於一種歷史責任感，我1950年代寫過早年毛澤東，1980年代後不斷寫晚年毛澤東，由此認識了不少這方面的學者專家，老中青三代都有，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執教的單少傑就是其中一位。

1995年春夏間，單將書稿第一至二篇交予我。在隨後幾年間，他又將書稿其餘部分陸陸續續交予我。2000年1月26日，他將修改好的全書第二稿送到我家，囑我寫一篇序言。書稿過去斷斷續續讀過，但耄耋之人隨讀隨忘，日常雜事又多，現在也不可能再通讀一遍。因此，序言只能寫一點浮面的話。

我從作者寫的「成書過程」中知道，19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時，他寫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民主觀的文章，前一部分題為〈輕諾延安寡信北京〉。這時到處興起一股「毛澤東熱」，並愈演愈烈。作者感到我們這個民族患有嚴重的「歷史健忘症」，忘記了自己剛剛經歷的苦難，於是在1993年底至1994年春，又寫出了一篇關於毛澤東政權暴力背景的文章。他在寫作這篇文章時得到過苗力田教授的指教。苗是古希臘哲學研究專家，主持翻譯過《亞里斯多德全集》。苗既介紹作者讀亞里斯多德《政治學》，又為作者審閱了這篇文章。在一種歷史責任感的驅使下，作者對毛澤東的研究一發而不可收，終於用五、六年時間，完成了這部五十餘萬字的著作。

單少傑是研究哲學與文史的學者，藉鑑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來研究毛澤東。亞里斯多德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古希臘思想家，他研究了一些希臘城邦因暴力而興又因暴力而衰的歷史。我沒有讀過西方學者尤其西方古代學者這方面的著作，但我相信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自有其共同規律；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道路，既有相異處也有相同處。用亞里斯多德有關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來對比研究毛澤東的執政成敗，會有借鑑啓示，可以順理成章。這種學者思想型的研究，我很是贊成(我自己沒有這種基礎)。

如關於廬山會議，作者指出，彭德懷上書，既對事又對人，對事涉及所批之事的範圍、程度、性質等方面問題，對人則觸及所批之人的應負責任、實際能力、工作作風等方面問題。作者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彭德懷批評毛澤東的言論，還是毛澤東批評彭德懷的言論，都有一個前輕後重的不對稱結構，先是有條件地肯定對方，繼而很嚴厲地批評對方。不過，毛的言論不僅有談話結構的不對稱，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對稱。「他可以負人，人不可以負他，頗有些曹孟德氣度。」關於毛澤東批鬥彭德懷，作者除了作出政治、思想、歷史等方面的考察外，還作出文化方面的闡釋，指出毛還承襲了古代君主在整治政敵和駕馭臣民時常採用的一些手段，「不守常規，不講章法，無巧不取，無所不為。」「太史公筆下的漢高祖，既有曠世雄主之風采，又有肖小徒輩之行色，幾分雄才，幾分痞氣。」「明太祖朱元璋則把謀害大臣的事做到極致處。」「毛澤東雖不好與史上名君相比，但作為能奪得天下者，自是有許多過人之處，自是一個在整治人事方面的長袖善舞者，陰柔之道也是爛熟於肚中的。」

作者根據自己熟讀過的經典理論著作，就毛批彭沒有理論思想，乃非馬克思主義的經驗主義世界觀，「言辭間多有對彭的輕蔑與嘲諷，以伶牙欺剛正，以利齒辱厚重」，指出，「實際上，毛所說出的那些大道理本身也有許多問題。他指責別人不懂許多東西，可他自己也未必真懂這些東西。」比如他說，經驗主義「是指馬赫唯心主義經驗論」，「就不準確了。因為，經驗主義是一外延較大的概念，不僅包括馬赫哲學，而且包括其他哲學，上自古希臘普羅泰戈拉哲學，中有英國經驗論，下至本世紀邏輯經驗主義哲學。」毛還告誡彭，「經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敵對體系。」作者認為這一說法也有問題：「按毛屢屢引為權威的那些經典作家的說法，在經驗主義哲學中，既有唯心主義派別，也有唯物主義派別，後者至少包括培根、霍布斯和洛克。」他們均被馬克思等推崇為現代唯物主義先驅。

過去，人們在談到毛澤東獨斷專行時，對其為所欲為方面談得較多，而對其遭遇抵制方面談得不夠。作者在書中強調：在執政黨最高決策層中，除

毛外幾乎所有成員都曾先後不同程度地作過努力，來阻止毛一意孤行，呈輪番抗爭之勢，並最終置毛於落孤陷寡之境。據我所知，事實也是如此，從「土改」開始，尤其從「農業合作化」開始，黨內高層就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有過分歧、有過爭論，按舊的說法即有「路線鬥爭」。對於毛所制定的那些具有「極左」性質的方針政策，黨內許多領導人都先後提出過不同意見，作出過勸阻努力，儘管最終都被毛一言九鼎地打壓下去。認真研究這些分歧、這些爭論，是很有意義的。作者還比較了毛的黨外反對者與毛的黨內反對者，認為後者的抵制力更大些，骨頭更硬些。對付黨外民主人士，毛只要搞些「陽謀」，便可打發了事；對付黨內異己力量，他就要處心積慮並傾其全力了。彭德懷在被打倒後，總是不服，今天寫一封自討苦吃的申訴信，明天又寫一封自討苦吃的申訴信，直到被癌症折磨得奄奄一息時，還要求同毛澤東見一面，把問題談清楚。

作者是教授、學者，這本書所利用的文獻和有關著作，是大量而廣泛的，是經過作者認真地梳理和鑒別的，所引材料比較詳實可靠，是經得起推敲的。作者同我談到，他在處理書中材料方面，花了很多工夫，寫得很苦。之所以如此，除要考慮寫學術論著所應考慮的那些一般要求外，還要考慮兩個特殊因素：一是，對於書中所寫的人和事，我國四十歲以上的人都有或大或小的發言權，當然說多說少不一。二是，在現今中國文化思想界，不僅「毛澤東餘威」猶存，且有「文革」餘孽和積習不改的文化酷吏及其走卒在活動，其中年紀較大者，過去曾當過「四人幫」的幫兇，如今仍懷有「雞蛋裡挑骨頭」這一習慣性心理。作者認為無法不讓他們在此書中捕風捉影，但應盡量不讓他們從書中找出學術硬傷。

翻讀原稿時，我對作者的感覺是，他將毛澤東嚴厲地擺在歷史天平上，很少顧忌，暢所欲言，敢言人之不敢言。有時還打比方、用典故，有的恰到好處，有的難免使人感到太尖銳了。關於毛澤東性格特徵，書中也有所論述。這裡舉三個例子：用一個多動症患者竟拎著一隻裝滿雞蛋的大籃子，來比喻「愛折騰」的毛澤東卻掌管著新中國所有權威資源這一局面。用袁紹因討伐

曹操失敗而惱殺田豐的典故，來解說毛澤東因搞大躍進失敗而加罪彭德懷這一史實。毛澤東晚年多病，卻不愛吃藥，並常同醫生鬧彗扭；這種諱疾忌醫的倔勁，不僅表現在醫病保健上，而且表現在施政用權上，既不願吃健體之藥，也不願吃治國之藥。

這本書所使用的語言是亦雅亦俗的，既適合專業研究者閱讀，也適合普通老百姓閱讀。其闡述舉重若輕，能把一些頗有深意的問題講得淺顯易懂。其行文簡潔流暢，很少有什麼生僻的字詞和生造的語句，多為熟詞和短句，有節奏感，可琅琅上口。

不同的讀者對本書會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是很自然的事。作為一個毛澤東研究者，由於種種限制，我雖然不可能像作者那樣毫無顧忌、暢所欲言，但我贊成出版這樣的書，因為毛澤東已走進歷史，無法不讓人評說。

1992年《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一書出版時，我在「前記」中說道：「當代的每一個中國人，同毛澤東是息息相關的。我們的勝利與失敗，正確與錯誤，前進與後退，歡樂與痛苦，乃至價值取向、思維習慣等等，都是同毛澤東分不開的，真是榮辱相關，生死與共。毛去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光輝——毛澤東思想仍照耀著我們，可是他的陰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也還籠罩著我們。」這是八年前說的話。難道毛澤東的陰影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嗎？人們啊，不要忘記剛剛過去的苦難的歷史。恩格斯說過：「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我相信作者的辛勞是會有收穫的，這本書對研究毛澤東尤其鑒戒毛澤東是會有好影響的。

李銳

## 序二

單少傑先生費了多年工夫寫成這部《毛澤東執政春秋》，而且不計個人的利害得失，毅然刊布，充分體現了孟子所謂「大丈夫」的風骨。僅此一點，已使我欽佩無已。但本書的價值還遠不止此，單先生是哲學家，具有思想的深度。我匆匆讀過原稿和〈關於本書寫作理念〉，才懂得他的用心之苦。他不僅僅是寫一部當代的信史，而是要重建價值系統，使中國人能恢復辨別善惡是非的能力。作者服膺康德哲學，他所處理的不但是歷史知識問題，而且也是道德問題。思辯理性和實踐理性，真與善，兼收而並蓄，是本書的一個最顯著的特色。他所用的「春秋」兩字取自孔子的原義。《春秋》是中國史學的大宗，兩千年無異辭。清代中葉考證學大興，褒貶之說漸受冷落，但章學誠仍然大聲疾呼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文史通義》卷5〈答客問上〉」

20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受西方實證主義的影響甚大，幾乎沒有人懂得《春秋》的深刻涵義了。但陳寅恪先生在1964年〈贈蔣秉南序〉中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寒柳堂集》）

陳先生中歲以前，治史也極盡客觀實證之能事，但晚經患難，終於回到《春秋》的傳說，於歐陽修仿《春秋》而寫成的《新五代史》特致推重如此。《春秋》之義在今天仍在史學上表現出生命的躍動，於此可見。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但他又在〈自序〉中引董仲舒的話，說《春秋》之旨在於「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這是公羊家口傳的孔子「大義」，可以說明《春秋》批判對象並不限於「亂臣賊子」，「無道」的「天子」也同樣在孔子「口誅

筆伐」的範圍之內。歷代皇帝對於史官的畏憚便是《春秋》確曾為中國人維護正義的顯證。所以近代史學大家柳貽徵先生也十分重視史官直筆，而逕以「史權」兩字稱之。（見柳貽徵《述實錄例》，《國史館館刊》第2卷第1期，1949年，頁1-9）。雖然過去有人懷疑過《春秋》究竟能不能發揮「亂臣賊子懼」的功用，但史實俱在，是無法否認的。讓我舉一個後世的例子為證。《晉書》卷82〈孫盛傳〉云：「《晉陽秋》（按「陽」字即「春」字，因避諱而改）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可見桓溫多麼怕《晉陽秋》的「詞直而理正」，以至要通過孫盛的兒子，以滅其一門為威脅。這個桓溫不是別人，他留下了一句名言：「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晉書》卷98桓溫傳）可見他嘴上雖說「遺臭萬載」也足以自豪，心裡還是怕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作者為了維護《春秋》的褒貶傳統，曾對黃仁宇先生的觀點反覆質疑。黃先生早年在密西根大學寫明代運河的博士論文時，我恰好趕上做他的論文指導人。論文完成後，我又介紹他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繼續作研究，寫成了《明代的稅制》（或稱為《16世紀明代財政與稅收》<sup>1</sup>）一書。甚至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的教職，也是由我一力推薦的。我和他的關係很深，不能不說幾句話。黃先生比我年長十幾歲，他是軍人出身，卅多歲才在美國上大學，勤苦奮鬥，著述不輟，是一位極可敬佩的學人。他深受中國文化傳統影響，最初堅持以「師禮」待我，但我堅決拒絕，因為在西方擔任論文指導的名義只是一形式，即使有所商榷，也是彼此都有進益。我引戴震不肯接受段玉裁、姚鼐為弟子的話，主張不妨「交相師」。他不得已而讓步，但仍引傅君劍贈胡適句：「文章風義友兼師」。因此我和他的關係可以說是「在師友之間」。但是他對中國史的看法和我頗有不同。這在西方是十分正常的事，我們之間也並未因之而減少互相間的尊重，一直到他逝世前都是如此。

1 編按：黃仁宇，《16世紀明代財政與稅收》（台北：聯經，2001年）。

黃先生是研究經濟史出身，他的《明代的稅制》引用了《明實錄》中大量的統計數字。這是他「數目字管理」說的來源。他大概又受到法國《年鑒》派的社會經濟史的影響，重視長期性的結構，這樣便形成了「歷史的長期合理性」的觀點。所以他的看法是有堅強根據的，絕非興到亂說。這一點我必須為他辯護。但西方史學早已進入多元化的階段，不再有統一的史觀。多元並存是正常的現象，而且恰恰顯出史學界的活力。經濟史家與傳統派史家的爭論更是屢見不鮮。十幾年前美國著名的經濟計量史學家(cliometrician)佛格爾(Robert W. Fogel)和英國傳統巨擘厄爾頓(G. R. Elton)的激烈辯論曾經轟動一時。佛格爾引用大量統計數字研究美國南方黑奴，其結論曾引起不斷的爭議，他並因此而獲得經濟學的諾貝爾獎。佛氏是反對在史學中表達個人觀點和價值判斷的，厄氏則持相反的意見。但理性爭論的結果則是雙方都作出必要的讓步，也更理解對方持論的根據。(可看他們兩人合著的 *Which Road to the Pas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黃仁宇的論點接近佛格爾，這是由於他們研究的對象相同所致。

最後，我願意指出，西方雖然沒有《春秋》褒貶的史學傳統，但西方史學史上所謂「道德判斷」(moral judgement)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19世紀以來，西方史學主流在實證主義、甚至科學主義的籠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學的模式處理人文現象，各式各樣的決定論主導著史學家的思路，不承認個人有真正的「自由」，個人與「物質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這種認知之下，道德判斷自然無從談起。但另一方面，在20世紀的史學實踐中，我們發現，想把史學變作自然科學同類的東西在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西方史學家，特別是猶太籍的，寫到希特勒統治下的納粹德國，使用的語言恰恰符合《春秋》筆法。1950年代以來，不少有慧見的史學家和歷史哲學家已突破了決定論的牢籠，坦率地指出：在歷史尋找所謂「規律」或「因果律」是徒勞無功的。這種努力過去不曾成功，現在沒有成功，將來也不會成功。以薩·伯林(Isaiah Berlin)在1950年代初所寫的〈歷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長文，尤有畫時代的意義。西方史學傳統的褒貶(praise and

blame)語言又在他的筆下復活了。由於詮釋派人類學進入了史學領域，以及新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所謂「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荒謬畫分，許多史學家今天已從追尋「規律」轉為追尋「意義」。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的話於是又獲得了現代的詮釋。

1993年哈佛大學俄國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國》(*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書，他在書末提出了這樣的問題：面對著這一場空前的災難，史學家是不是應該還是保持冷靜，像科學家面對著自然現象一樣，不動一絲感情？他所給予的答案是徹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紀德國史學家的話：「我認為寫史必須帶著憤怒和熱情」；再引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上的話：「對於應該憤怒的事情而不發怒的人，我們只能以愚人視之」。派普斯最後更提出了一個有力的反面論證：拒絕對歷史事件下判斷其實也是根據一套道德價值的系統。沉默等於承認一切發生過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對的。這是為歷史上所以勝利者做辯解的一種說辭。(頁509-510)毛澤東和史達林第一次見面時，有下面這一段有趣的對話：

史達林非常激動，對毛主席讚不絕口，說：「偉大，真偉大！你對中國人民的貢獻很大，你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子！我們祝你健康！」  
毛主席回答說：「我是長期受打擊排擠的人，有話無處說……」

毛主席言猶未竟，史達林卻把話接了過去：「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sup>2</sup>

史達林最後一句話是所有共產黨人都接受的「公理」。這條「公理」在

---

2 師哲，〈陪同毛澤東訪蘇〉，《毛澤東軼事》（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336。

西方可以追溯到黑格爾的名言：「凡存在，即合理」(Whatever is is right.)；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上，陳亮(1143A.D.–1194A.D.)的觀點也可以與之相印證：「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試問：如果我們真的擁抱這一「公理」，真、善、美一切價值還能在人間找得到一隙存在的餘地？

我特別引派普斯《布爾什維克政權下的俄國》和單先生《毛澤東執政春秋》相印證，因為這兩部書恰好遙相呼應。無論就政權的性質、歷史過程的悲慘、或主要人物的殘忍而言，這兩部書都是處處相稱的。派氏全書終於這段歷史的「道德涵義」(moral implications)正相當於單先生的「春秋」。派氏引康德「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經典之論，又引波普爾(Karl R. Popper)的名言：「每一個人只有為自己可選擇的志業而犧牲的權利，但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去鼓勵別人為一個理想而犧牲。」康德和波普爾不也是單先生最欣賞的哲人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此見之。

讀了派普斯這些議論，單先生也許會感到「吾道不孤」吧！

余英時 序於普林斯頓

# 目次

序一.....	I
序二.....	VII
第一篇 導論：暴力與政權.....	1
第二篇 建設：大躍進與廬山會議.....	79
第三篇 轉折：七千人大會與八屆十中全會.....	173
第四篇 革命：四清運動反帝反修文藝批判.....	299
第五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上).....	393
第六篇 革命：文化大革命(下).....	499
尾聲.....	615
附錄 略談中國史學雙重職能.....	625
後記.....	634

# 第一篇

## 導論：暴力與政權

## 引言

1893年，毛澤東誕生於湘潭韶山。這一年是舊曆癸巳年，即「蛇年」。不過，毛似乎不屬「蛇」而屬「龍」。

五十六年後，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操著一口湖南土腔宣告一個新國家誕生了。餘音繚繞之際，隆隆砲隊碾壓過長安街面，滾滾人潮翻湧在金水橋前。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中共黨史被分成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兩大階段。百年中國也就有了「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世界。

正是以這一年為界，一些人半生戎馬、半生新貴，另一些人半生縱橫捭闔民國官場、半生登高山兮望我大陸。

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前者，他從中國最貧瘠的地方，拉起了一支最強悍的隊伍，打了一場最難打的戰爭，走了一條最難走的路，並最終走進了北京城。後者，他憑藉新國家的力量，對抗美國，頂撞蘇聯，爆了核彈，發了衛星，但也引發了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製造了殃及上億人的大冤獄。

毛澤東做這兩件大事功過如何？

前中共宣傳部長陸定一評價道：

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做後一件大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

陸定一有60餘年共產黨人生涯，走過兩萬五千里長征，管過全黨宣傳工作，有閱歷，也有眼光。陸還長期在中央工作，受毛直接領導，對他既有就近觀察的機會，又有身臨其境的感受。該部長對該主席的評價，當屬知根知

底者言。

當然，陸公評說不可能價值中立，而多有政治傾向。他所謂「成就」即於中共有利，所謂「錯誤」即於中共有害。在他看來，毛做第一件大事之所以有功就在於使中共較快地奪得天下，做第二件大事之所以有過就在於使中共差一點丟了江山。

對於毛所做的兩件大事以及陸所作的相關評價，人們可以提出這樣一些問題：

毛奪取政權與毛執掌政權有何聯繫？

其「大功」對其「大過」有何影響？

在其奪權業績與其執政業績之間是否存在一種反相關關係？

這種反相關關係可表述為，暴力革命越成功，和平經營就越有可能遭致失敗；或暴力革命勝利得越徹底，就越有可能給由暴力做成的政權帶來較難治愈的後遺症。

這些問題均可被提升為一個更一般亦更基本的問題：

暴力與政權關係究竟如何？

## 1

談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似不能不提這兩個人：

一是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論斷；

二是亞里斯多德——闡述了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

很可能在許多人看來，這兩個人風馬牛不相及，既有著時間與空間上的巨大跨度：一是今人，一是古人，一是中國人，一是外國人；也有著職業與性格上的顯著差別：一是政治家，一是學問家；一是不亦樂乎於和天地鬥、和人鬼鬥，一是不亦樂乎於漫步花園、逍遙講學。

不過，他們也有相似地方，即都對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有興趣，並都在這方面有建樹。其中一人本身就是一位馬背君主，憑藉暴力打出了一個血染的中國。另外一人自己未能親臨疆場，卻做過一位馬背君主的先生，目睹了這個被稱做亞歷山大大帝的學生如何暴興又如何速衰的過程，還研究過許多希臘城邦因暴力而興因暴力而衰的歷史，留下了一部《政治學》。

他們分別從自身角度揭示了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所涵蓋的兩個顯然有別且又密切相關的方面：一個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前半部分，即暴力可以打出政權來；另一個則著重揭示了這一問題的後半部分，即用暴力打出的政權容易衰敗。兩者著重點不同，但可前後連接，有很強的相關性。當然，這種相關性主要是解釋意義上的。

192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搞起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搞得北伐戰爭、農民運動、工人運動如火如荼。在這期間，年青的中共犯了一個毛澤東稱之為「書生主觀的錯誤」，即只做民眾運動，不做軍事運動，不重視建立自身武裝，結果導致了國共分裂後的嚴重局面：拿槍桿子的國民黨把不拿槍桿子的共產黨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慘痛的失敗使中共領導人終於明白過來，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沒有共產

黨的槍桿子，就沒有共產黨的發言權。於是，他們來到武漢，於1927年8月7日舉行中央緊急會議，做出武裝反抗國民黨決定。正是在此次會議上，湖南辣子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並義無反顧地表達了他不留中央當「書生」而去下面做「土匪」的決心<sup>1</sup>。

「八七」會議後，毛說幹就幹，策畫秋收暴動，組織工農武裝，建立紅色政權，一幹就是廿二年。從中，人們可以看到槍桿子與政權間所能有的最直接的聯繫，既可看到其間質的聯繫，即有紅色武裝就有紅色政權，也可看到其間量的聯繫，即有多少桿槍就有多大地盤：

- 當他有了「紅四軍」數千桿槍時，便割據綿延數縣的湘贛邊界；
- 當他有了「紅一方面軍」數萬人馬時，便建起縱橫數十縣的中央根據地；
- 當他有了數十萬「八路軍」、「新四軍」時，便與老蔣、鬼子三分天下；
- 當他最終有了數百萬「解放軍」時，便一舉奪下中國大陸，並使自己做了紫禁城裡的新主子。

與毛澤東不同，亞里斯多德基本上是一個學者型人物，先在阿卡德米學園當柏拉圖的學生，後到馬其頓王宮任亞歷山大王子的先生，再後又開呂克昂學園做逍遙學派的宗師，一生大多數時間都立於靜僻之處冷觀世事變化。

他在考察希臘城邦政治時，揭示這樣一種現象：「許多依仗武功的城邦，僅適合戰爭生活，一旦實現霸權而停止戰鬥，就會迅速衰落下去。在和平的年代裡，他們就像一把塵封的鏽劍。」<sup>2</sup>

他以斯巴達為例，指出其國家目標是十分可疑的：

「整個體制都只是為戰爭服務的，以保證他們能夠克敵致勝。因此，只要戰爭仍在繼續，斯巴達人就能保持優勢。可是，當他們一旦取得戰爭勝利，

1 參見國防大學編，〈「八七」中央緊急會議〉，《中共黨史教學參改資料》，第14冊，頁1-12。

2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貝克爾本，1334a，（商務中文本1965年），頁392；倫敦英文本（1912年），頁230。

便立刻開始衰落下去。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享用閒暇的時光，不懂得如何處理戰爭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戰外，別無所長。」<sup>3</sup>

他們「在戰爭中，在辛勞中，顯示出很好的品質，但到了和平時，到了閒暇時，就墮落下去，就顯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隸品質。」<sup>4</sup>

他還具體地陳述了斯巴達的種種弊端<sup>5</sup>：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種硬梆梆的缺乏彈性的外交姿態來處理國家間關係，致使「所有鄰邦」，如「阿爾卡斯人，麥西尼亞人，阿卡地亞人都與其長期為敵」，致使自己長期處於嚴峻的國際壓力之下。

在經濟上，它的財產制度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它的賦稅政策又致使國庫空虛，結果「國家日漸貧困，私家則日趨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著元老院組織，可是，「智慧猶如身體，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衰弱的」；並且，「身為元老的人在處理公務時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儘管斯巴達也有監察制度，但監察官員們大都對城邦普通公民「太嚴厲」而對自身「太放縱」了。

在社會風氣上，許多斯巴達人好奢侈，好貪婪，尤其好淫亂——亞里斯多德正是據此得出「一切好戰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結論，並且好偽善——一面發誓要遵守嚴格的斯巴達律，一面又「偷偷地違反法律而去尋求感官的快樂。」

亞里斯多德還考察了所謂「第三種僭主政體」<sup>6</sup>。這也是一種源於暴力的權力體制，其間既有靠著雇佣軍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著武裝民眾力量上台的僭主。後者多曾是平民領袖，故很容易竊用民眾的力量。

這些僭主們一旦執掌大權，就實行個人獨裁制，任意踐踏城邦公民的各

3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貝克爾，1271b；商務，頁91；倫敦，頁56。

4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貝克爾，1334a；商務，頁394；倫敦，頁231。

5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2卷，第9章。

6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4卷，第10章。

種權利。「其統治的目的只服從於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顧及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亞里斯多德不無厭惡地稱這種政體為「暴力的統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這種暴政也大多不能長壽。

亞里斯多德對「斯巴達」和「第三種僭主政體」的這些論述，似是言猶未盡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說這兩種暴力政權的同時，又影射另一種暴力政權。

就在亞里斯多德主持呂克昂學園期間，亞歷山大正率領他的馬其頓軍團東討西伐、南征北戰，硬是打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軍威、打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僅不提這個大帝國的事情，反而專揀歷史上那些崛起與馬其頓相類似而結局均不好的政體來大加闡釋。這很像是在藉古諷今：明說斯巴達，暗指馬其頓；明斥僭主，暗諷亞歷山大帝。先生似是想以古為鑒地告誡學生，刀劍興國的事，開場戲好看，收場戲就難說了。

歷史似也公平，既給弟子提供了表演盤馬彎弓的機會，也給先生提供了顯示遠見卓識的實例。亞歷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國也隨之衰落下來，很快分裂為三，即安提哥尼王朝(the Antigonids)、塞琉希德王朝(the Seleucid dynasty)和托勒密王朝(the Ptolemies)。在漫漫歷史星空中，亞歷山大帝國就像一道閃電，雖耀眼奪目，卻轉瞬即逝。這恰好印證了亞歷山大老師的思想。

儘管先生與弟子有很大差別，一個貶斥暴政，一個推行強權；但師徒二人也有許多聯繫，一個把暴力與政權的關係說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則把弓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樣樣實在。先生說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寫出的文字來予以論證，也可藉教出的弟子來加以驗證。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說，《政治學》這部書無疑是他的一篇傑作，而亞歷山大這個弟子何嘗不也是他的一篇傑作。

便立刻開始衰落下去。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享用閒暇的時光，不懂得如何處理戰爭以外的事，除了能征善戰外，別無所長。」<sup>3</sup>

他們「在戰爭中，在辛勞中，顯示出很好的品質，但到了和平時，到了閒暇時，就墮落下去，就顯示出某些最卑劣的奴隸品質。」<sup>4</sup>

他還具體地陳述了斯巴達的種種弊端<sup>5</sup>：

在外交上，它常常以一種硬梆梆的缺乏彈性的外交姿態來處理國家間關係，致使「所有鄰邦」，如「阿爾卡斯人，麥西尼亞人，阿卡地亞人都與其長期為敵」，致使自己長期處於嚴峻的國際壓力之下。

在經濟上，它的財產制度導致貧富不均、兩極分化，它的賦稅政策又致使國庫空虛，結果「國家日漸貧困，私家則日趨貪婪。」

在政治上，它仍保留著元老院組織，可是，「智慧猶如身體，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衰弱的」；並且，「身為元老的人在處理公務時常常是徇私舞弊的」。儘管斯巴達也有監察制度，但監察官員們大都對城邦普通公民「太嚴厲」而對自身「太放縱」了。

在社會風氣上，許多斯巴達人好奢侈，好貪婪，尤其好淫亂——亞里斯多德正是據此得出「一切好戰的民族往往好色」的結論，並且好偽善——一面發誓要遵守嚴格的斯巴達律，一面又「偷偷地違反法律而去尋求感官的快樂。」

亞里斯多德還考察了所謂「第三種僭主政體」<sup>6</sup>。這也是一種源於暴力的權力體制，其間既有靠著僱傭軍力量上台的僭主，也有靠著武裝民眾力量上台的僭主。後者多曾是平民領袖，故很容易竊用民眾的力量。

這些僭主們一旦執掌大權，就實行個人獨裁制，任意踐踏城邦公民的各

---

3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貝克爾，1271b；商務，頁91；倫敦，頁56。

4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貝克爾，1334a；商務，頁394；倫敦，頁231。

5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2卷，第9章。

6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4卷，第10章。

種權利。「其統治的目的只服從於他自己的私利，而不顧及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利益」。亞里斯多德不無厭惡地稱這種政體為「暴力的統治」，是「世上一切自由人所不能忍受的暴政」。這種暴政也大多不能長壽。

亞里斯多德對「斯巴達」和「第三種僭主政體」的這些論述，似是言猶未盡的，甚至是含沙射影的，即在明說這兩種暴力政權的同時，又影射另一種暴力政權。

就在亞里斯多德主持呂克昂學園期間，亞歷山大正率領他的馬其頓軍團東討西伐、南征北戰，硬是打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軍威、打出了一個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先生似乎不看重弟子這些赫赫武功，在其著述中不僅不提這個大帝國的事情，反而專揀歷史上那些崛起與馬其頓相類似而結局均不好的政體來大加闡釋。這很像是在藉古諷今：明說斯巴達，暗指馬其頓；明斥僭主，暗諷亞歷山大帝。先生似是想以古為鑒地告誡學生，刀劍興國的事，開場戲好看，收場戲就難說了。

歷史似也公平，既給弟子提供了表演盤馬彎弓的機會，也給先生提供了顯示遠見卓識的實例。亞歷山大一去世，他用暴力打出的帝國也隨之衰落下來，很快分裂為三，即安提哥尼王朝(the Antigonids)、塞琉希德王朝(the Seleucid dynasty)和托勒密王朝(the Ptolemies)。在漫漫歷史星空中，亞歷山大帝國就像一道閃電，雖耀眼奪目，卻轉瞬即逝。這恰好印證了亞歷山大老師的思想。

儘管先生與弟子有很大差別，一個貶斥暴政，一個推行強權；但師徒二人也有許多聯繫，一個把暴力與政權的關係說得頭頭是道，另一個則把弓馬打天下的事情做得樣樣實在。先生說了，弟子做了。先生既可用寫出的文字來予以論證，也可藉教出的弟子來加以驗證。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說，《政治學》這部書無疑是他的一篇傑作，而亞歷山大這個弟子何嘗不也是他的一篇傑作。

## 2

若對毛澤東與亞里斯多德作進一步比較的話，就會發現他們在研究課題與研究時間上是相互錯位的：

後人毛澤東做了前半截子文章——暴力可以奪取政權；

前人亞里斯多德做了後半截子文章——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

一般說來，後人續做前人文章要好做些。他可以站在前人之上而比前人看到更遠更多的東西，既可看到前人已經說過的東西在後來的實踐中是怎樣驗證的，又可看到前人從未說過的東西在後來的現實中是怎樣發生的。

反之，若讓前人續做後人文章就勉為其難了。亞里斯多德可以一般地推論在其之後的一些戎馬帝國將會衰落下去，但無法具體地說明它們究竟是怎樣衰落的，比如，無法具體地說明毛澤東的槍桿子政權究竟是怎樣衰落的。他一不知有「紅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事，二不知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事，也就很難接著毛的話往下說了。

顯然，要續做毛澤東的那個「前半截子文章」，就不能全靠亞里斯多德的那個「後半截子文章」，還要一靠後面人來加以補做——因為他們看到了亞氏看不到的現代東西，二靠中國人來加以補做——因為他們擁有著對其故土文化的親身感觸。

事實上，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暴力更替政權的事件，都發生在亞里斯多德視野外，或在其生年之後，或雖在其生年之前但在古希臘之外。其間，有的事件能夠為他的學說所解釋，從而印證他作為大思想家所具有的那種超越時空的思維力；有的事件則不能被他的理論所涵蓋，從而顯示他作為古希臘人所具有的那種無法避免的局限性。比如，依據他的學說來解釋中國歷史，有些事能夠說個大概，有些事就很難說清楚了。

中國人搞政權方面的鬥爭，講的是實力，而最重要的實力就是暴力，就

是軍隊力量。中國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新興朝代不是依仗暴力而平定天下的，沒有哪一個開國皇帝不是靠著軍隊而黃袍加身的。朝廷裡最重要的政事叫軍國大事。

後來的毛澤東，也是先獲最高軍權，後獲最高黨權乃至最高公職的，並至死都不讓出軍委主席一職。在毛之後的鄧小平，也是極為看重自己的軍委主席身分的，遲至八十五歲才讓出這一職務。他的屬下感恩戴德地頌揚道：這位世紀偉人身體力行地為結束領導幹部終身制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可這些頌揚者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即他們的頌揚對象已經做了中國有史以來最高齡的軍事統帥，創下前無古人並很可能是後無來者的記錄。另外，此公就在退職前不久，還做了一件能上史冊的大事——揮師進軍沒有敵軍只有百姓的自家京城，槍聲一片過長街。

人們因此而有理由說，一個國家的軍權占有什麼樣的地位與這個國家的文明達到什麼樣的程度呈反相關關係：前者愈高後者愈低。

聰明的帝王有時也會請些儒士來講王道，講講寬厚待民，講講仁義之師，但主要是講給老百姓聽的，講給那些只知孔孟的書呆子聽的。他經常提醒自己的是，不忘霸道，不忘嚴刑峻法，不忘威武之師，不忘軍權才是自己安身立命、起家做皇上的根本。

按照亞里斯多德關於源於暴力的政權易於衰敗的思想，——可設為大前提；又根據中國的王朝都是刀槍打天下、弓馬奪江山的史實，——可設為小前提；那麼，依此我們能夠推證出什麼呢？——可導出結論：中國的王朝均為暴興速衰，中國的皇帝就像走馬燈那樣換個不停，中國的王位戰爭當是此起彼伏、經久不息。

這一結論能不能成立？或者說，這一推論的大前題能不能有效地運用於中國歷史？這是一個很難用「是」或「不」來回答的問題。

中國歷史上確有過許多暴興速衰的短命王朝。第一個建立在諸侯征戰上的中央帝國(秦始皇的秦帝國)，最後一個建立在農民起義上的北京政權(李自成的天啟國)，以及「東晉十六國」、「五代十國」，等等，都是暴興速

衰的，長者不過幾十年，短者僅存數十日。

中國歷史上也確有過許多暴興而不速衰的長命王朝。漢、唐、宋、明、清都存在了兩百年以上，其中兩漢累計426年，兩宋累計320年。東晉、北魏、西夏、遼、金都存在了一百年以上，連最具暴力性質的元朝也存在了近一百年。可見，若就政權個數而言，中國封建王朝大多是暴興速衰的，短命朝比長命朝要多得多，故與上述亞里斯多德思想較為接近；若就總體時間而言，中國封建社會大都處在那些暴興而不速衰的王朝的統治下，故又與上述亞里斯多德思想相差甚遠。

中國史上許多明智的開國君主在用暴力奪得天下後，便立刻調整自身行為方式，變好戰愛鬥為沉穩舒緩，變暴力行事為和平經營，遏制武將，重用文臣，薄賦輕徭，盡量不過多地折騰老百姓，以使他們能夠休養生息，進而安居樂業。

在他們諸多開國舉措中，最重要者是進行制度方面建設。他們處心積慮地組建各種權力機構，頒發各類法規律令，以使政府舉措和百姓行為都能夠規範化，以防止統治的隨意化和被統治的無序化。

聰明的開國帝王深知自己的子孫生於榮華富貴中，不可能像自己那樣具有從逆境中奮起的志向和能力，如果完全隨著這些子孫的心意來行事的話，就有可能把朝政大事弄得混亂不堪，就有可能今日這樣做、明日那樣做，兒皇帝做這一套、孫皇帝做那一套。於是，他們未雨綢繆，為子孫立下種種規矩，以使他們的行為舉止有所依循，而不任意妄為、害國害家害己。

他們這樣做，實是把自己的過人才智凝結為法規律令留給子孫皇帝，換句話說，實是把自己在才智方面的優勢基因以一種外在化形式遺傳子孫皇帝。這好比要知道一塊木料的長短，若無尺子的話，就只有最靈巧的木匠師傅才能估量出來；若有尺子的話，即便是最愚笨的木工徒弟也能測得准數。聰明的開國君主正如這靈巧的木匠師傅，其不肖子孫也如這愚笨的木工徒弟，而法規律令則如這把尺子——是這師傅做出來留給這徒弟的。

例如明朝，自成祖以降沒有出過什麼好皇帝，朱家龍椅上坐的多是平庸

之輩或荒唐之徒，可朱家天下竟維持了兩百多年，成為中國史上少有的幾個長命王朝之一。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該朝統治體制相當完備，以致於那些碌碌無為的皇帝也能靠著它坐住江山。明神宗十幾年不理朝政，昏得可以，但其名下的國家機器竟還能夠運轉，儘管不時出些故障。

明朝制度的基本框架多是由其開國皇帝朱元璋定下的。這位明太祖打下江山後，便忙於國家體制建設，先是承接先朝制度，後又對其作大刀闊斧的改革。例如，在中央政府中，撤銷中書省，抬升六大部，後又添設殿閣大學士制；在地方政府中，撤銷行中書省，分權三司，即布政使司(行政)、按察使司(司法)、都指揮使司(軍事)。他坐天下比打天下還忙還累，苦心經營數十年，終於建起一個嚴密且嚴酷的國家體系，集數千年中國封建專制制度之大成。他終於為朱家王朝做成了一把很管用的尺子，並傳了下去。其不肖子孫只要拿著它，就能大致地測度天下。

聰明的開國帝王還深知自己的子孫只是因血統而登基，僅憑他們自身才德難以服眾，難以使百姓和百官從心裡敬畏他們。於是，他們又為子孫皇帝立下許多嚴酷刑法。

他們這樣做，也是在搞他們的體外遺傳，即把自己身上所具有的那種斬將翦寇而平定天下的威嚴，以一種制度化形式遺傳子孫皇帝。人們可以不敬畏當朝的庸君，但不能不懼怕先皇立下的王法。滿清末年的臣民不會打心眼裡去敬仰那位只有三歲的小皇帝，但不能不在乎那個能叫人掉腦袋的「大清律」。這時清王朝儘管已瀕臨崩潰，但仍能依照其「王法」砍了不知其數的人，並砍的多是英雄好漢、仁人志士，多是敢於反對朝廷的人。

人們常常指責封建君主施行「人治」，即僅憑他們個人意志來進行統治。這種指責有些大而化之。中國史上確有一些皇帝為所欲為、不受任何約束，但大部分皇帝所作所為是受方方面面制約的。他們若是完全由著性子來行事，就會上違祖宗家法、下招大臣非議。明神宗不理朝政十幾年，也被大臣們不時參劾了十幾年。他曾屢屢想換太子，但均被大臣們以祖制不可違理由予以否決。這樁樁不順心的事使他後來談起朝政便悶悶不樂、鬱鬱寡歡。正

由於受到許多限制，中國史上一些生性活潑的帝王常常羨慕宮外平常人家的生活。

上述明智的開國君主通過一系列舉措尤其是建制方面的舉措，較好地完成了由暴力創業向和平守成的轉變，從而使其新興帝國暴興而不速衰。這就使得上述亞里斯多德思想在他們這裡失去了闡釋力。

不過，在中國漫長歷史上，也還有一些能夠創業卻難以守成的開國者。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都有。

其一，打得江山後，不求進取，吃喝玩樂無不享用至極。他們還有一番道理：老子過去打天下流血流汗，現在坐江山自是要多吃多占。這實是一種盜寇心理：搶來的東西，就要盡情地消受。但搶的東西再多也有限量，坐吃也能山空。他們的江山坐不了多久。

其二，打得江山後，不改稟性，過去好勇鬥狠，現在仍是愛與人鬥、好與人爭，過去愛破壞愛折騰，現在仍是逢物必破壞、遇事必折騰。他們是屬猴的，猴氣十足，屁股坐不住。打江山時坐不住，還有些道理，因為本來就沒有屬於他們的位子可坐；打下江山後仍是坐不住，就沒有道理了，因為有自己的位子不坐而到處跑動，只會給自己添亂。他們的江山也坐不了多久。

這兩類開國者的共同點，就在於他們都沒有能夠很好地實現其行爲方式和工作重心的轉移，尤其是都沒有能夠很好地建立起那種不論對統治者還是對被統治者均有約束力的制度，從而導致其國運暴興速衰。這倒也印證了亞里斯多德思想。

## 3

當我們把視角轉到離我們最近的開國者身上時，便面臨這樣的問題：亞里斯多德上述思想對毛澤東所作所為有無闡釋力呢？這兩位研究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的古今大家且中外大家能否相互印證呢？

若粗線條地看，不難發現兩者間有某些聯繫，發現前人對後人作了某些能被大致驗證的預見。若較具體地看，則可看出兩者間有巨大差別：年代相隔太久，地域相距太遠；並且還是前人續做後人文章，其間的出入也就更多。

毛澤東所執掌的政權，無疑是「暴興」的，即通過暴力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硬打出來的。那麼，它是不是「速衰」的呢？答案似是肯定的，這一政權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衰落下去的。當老人家去世時，他的國家也隨之瀕臨「崩潰的邊緣」（中共中央文件語）。

毛澤東就創業來說，可與中國史上一些較成功的開國君主相比；但就守成而言，恐怕要跌入其間較差的等級。他既做成平地高樓，又弄得大廈將傾。

1949年，毛澤東終於走完了千山萬水，由西柏坡進駐北京城，並於群英簇擁中登上了天安門，可謂榮耀之至。

據其衛士回憶，當時，像柳亞子、李濟琛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輩們見到毛澤東，都習慣做一個動作，豎起大拇指，輕輕晃動著誇耀毛澤東。那時聽到的最多的話是「真偉大」，「最偉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國無敵手的軍事家」，「我們都是經歷過幾個朝代的人，沒有哪一個朝代的人能跟毛澤東比……。」<sup>1</sup>

說這些話的老先生們，大多是那個時代的所謂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歷史上或有過不買袁世凱帳的紀錄，或有過不聽蔣介石話的舉動。他們過去

1 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31-132。

不願攀附權貴，如今也不會一下子變得很世故、很會巴結人。他們讚譽毛公當是發自內心的。

可問題是，他們說話時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澤東在事業上的轉折點，他們只能看到其創業已經走過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將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確能使人產生敬畏感。因為，毛贏得的是，中國史上最大規模、最為艱辛的戰爭。但若再看到後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將會使人產生什麼樣的感受？還能不能繼續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幾十萬最愛說話的知識分子卻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們就會發出此主席真夠厲害的感嘆。因為，這是他們所熟悉的那位蔣總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國民黨執政時的耳根遠不如它的後繼者來得清靜。當時，人們在大眾傳媒上還不時能看到魯迅等痛罵論敵的文章，在大學課堂裡也不時能聽到李達等講授馬克思學說的聲音。

若再看上十來年，看到幾千萬種糧食的農民卻因沒有糧食吃而被餓死，他們又會生出此主席確有罪過的想法。因為，這是他們在滿清時期、民國時期、甚至日本侵華時期都未曾看到的人為性大饑荒。

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場殃及數萬萬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就會覺著此主席做得太過分了。因為，這不止是他們未曾經歷的國恥國難，而且是他們聞所未聞的國恥國難。

那麼，毛澤東為何在「暴興」後「速衰」？為何在執掌政權方面如此不成功？對此，亞里斯多德的那個「後半截子文章」似能提供某些解釋性思路（就其抽象意義而言）。

亞氏在考察一些像斯巴達那樣的尚武城邦的歷史時，指出它們大都犯了一個本末倒置的錯誤，即把它們的手段當做它們的目的<sup>2</sup>。

「人生包含不同的方面——勤勞與閒暇，戰爭與和平」，其中，「戰爭只應是導致和平的手段，勤勞只應是獲得閒暇的手段」。人們進行殘酷的戰

2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7卷，第14章；第8卷，第3章。

爭本應是爲了獲得安定的生活，進行勤勞的工作也只應是爲了享用優裕的時光，並最終使人們能在一種恬然自足的環境中從事理性思考即「沉思」（亞里斯多德認爲「沉思」能充分體現「智慧」這一人類的最高美德，故爲人生的最高境界）。「我們一再申明的是享有優裕閒暇的時光是全部生活的目的。」

可是，斯巴達的「立法家們以戰爭和克敵致勝爲其政治制度的目的」，「整個國家制度都是以戰爭事務爲其目的」，從而把本應做爲手段的東西當成了目的。斯巴達人只重於戰爭訓練，只長於好勇鬥狠，結果使他們在戰爭勝利後不能適應和平的生活，長此以往也就不能保住自己通過暴力而獲得的東西。

誠然，亞氏所說的人生內涵與後人所理解的人生內涵不盡相同，古希臘自由民享有閒暇的方式與現代公民享有閒暇的方式也有很大區別；但他在這裡提出了一個值得後人借鑑的思想：在人生的追求中或在國家的崛起中，不應把人們所憑藉的東西當作人們所追求的東西，不應把其奮鬥的手段當做其奮鬥的目的。

亞里斯多德對斯巴達這一批評似也適用於毛澤東。後者崇尚鬥爭，以致於把它作爲人生的一種追求。他曾說過一句名言：「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這就把鬥爭當做他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種理想境界。他講哲學也是大講鬥爭性，認爲鬥爭性貫穿於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中，是無條件的、絕對的<sup>3</sup>。世人也因此將他的哲學恰如其分地稱作「鬥爭哲學」。

當處於強大敵人壓迫下，當處於在野黨地位上，毛強調鬥爭尚可理解。因爲，不鬥爭則亡，不鬥爭則不能奪得政權。鬥爭在這裡只是作爲維護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種手段，只是作爲實現自己權力目的的一種手段。

可是，當已經打敗強大敵人乃至消滅他們人身存在時，當已經獲得全國政權並且得到大多數人認可時，他還要鬥、還要把鬥爭看做是高於一切的事

3 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第5節，頁315-321。

業，就沒有道理了。這時，他應該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與人相鬥，而是建設、而是與自然打交道。

事實上，他執政後所革的命、所鬥的人，大多是他不應該革的命、不應該鬥的人。因此，這種鬥爭的實際意義，已不在於鬥爭什麼對象，而在於鬥爭本身。於是，過程本身上升為目的，鬥爭成了「遊戲」。一切遊戲的特點，就在於目的即過程。

然而，這種「遊戲」並不好玩，相反很是殘酷。1950年代「反右」，鬥了幾十萬知識分子，後來又給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說是搞過火了。1960年代「文革」，又鬥了幾百萬老幹部，後來又把他們中絕大多數的人宣布解放，又說是搞過火了。這是反反覆覆以一種十分嚴肅的態度做著一些顛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種「遊戲」、一種幽默，一種全然黑色的幽默。沒有幾個人能就此笑得出來，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過，老人家倒有可能從中感到生活的充實，進而達到他的「與人鬥其樂無窮」的境界。

這一「遊戲」本質上是整人的，並且是大規模整人的。由於處在執政者的地位上，毛與人相鬥實是強者對弱者的隨意處置，即對後者可以採用包括批判、羞辱、關押、刑訊、槍決在內的任何手段。又由於具有被神化的個人權威，毛的任何整人舉措都能獲得廣泛的響應，甚至能搞成一場波及全國的「運動」。他不鬥則已，一鬥即整；不整則已，一整便動之於天下。

毛澤東「鬥」了一生，也「樂」了一生；只是樂了一人，苦了眾生。他前半生鬥了許多確想傷害他的人，鬥得多少有些情理；後半生則鬥了許多不想傷害也無法傷害他的人，甚至鬥了許多相信他並支持他的人，鬥了許多愛他勝過愛自己的人，鬥得就大謬不然了。

亞里斯多德還從正面考察了一些像梭倫那樣的執政者的政績，指出他們突出的貢獻，就在於積極制定各項法律制度，並嚴格依據法律進行統治。因為，「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義的尺度」，「法律的統治優於個人的統治」。反之，「讓某一個人來統治，就會使政治帶上獸性的成分，因為他的慾望有時會支配他，他的情感會影響他，即便是最賢

達的人也在所難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慾的影響。」<sup>4</sup>

亞里斯多德對梭倫等的這一讚譽，似也能反襯出毛澤東的一些問題來。毛執政後未能很好地實現由社會革命者角色向社會建設者角色轉變，不注重制度化建設，而總想不停頓地變革。他也曾搞過一些制度化東西，但隨後又去破壞它們。他總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規矩，也破自家的規矩。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就是既要變革舊世界已有過的東西，也要變革新社會剛建立的東西，比如，要砸爛「公檢法」，要打破各項規章制度對革命群眾的「管卡壓」。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規矩。據其衛士回憶，他過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過的一天24小時，而是根據其特殊生活習慣安排的一天28小時，即所謂「毛澤東的一天」<sup>5</sup>。他散步常常不走現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兒走就往那兒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種天然的反成規反秩序的傾向。

毛澤東這種行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樣——「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比較適合於打破一個舊世界，但不適合於建立一個新世界。

4 亞里斯多德，《政治學》，第2卷，第12章，1273b-1274a，第3卷，第16章，1287a-b。

5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頁117。

## 4

關於毛澤東「暴興」政權何以「速衰」問題，除了可借鑑前人思路來予以闡釋外，更應立足於這一政權自身運作過程來加以闡發。

毛澤東政權可以說是一個很少受制約的政權，既很少受外部政治力量制約，又很少受內部政治因素制約，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個想要幹什麼就能幹什麼的政權，並因此而做了許多說有多荒唐就有多荒唐的事情。對毛本人來說，似乎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不敢幹的事。

一個執政黨在政治上所受到的外在制約力，通常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公然要趕其下台的政敵，即體制外的各種反對派組織；二是嘮嘮叨叨要分享其權力的盟友，即聯合政府中的各個小兄弟黨團。毛澤東的執政黨也有這樣的政敵和這樣的盟友。不過，這對它來說，兩者都構不成重大威脅，都形不成有效制約力。

先就政敵方面情況來看。

其一，在這一政權「暴興」過程中，其執政黨的老政敵即蔣介石國民黨被清理得比較乾淨，已不可能對它形成有效制約力。

由於採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手段，憑藉的是能夠射殺生命的槍桿子，毛澤東在獲得政權同時，就不只是把政敵趕下台去，而且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消滅了，從肉體上清除了。剩下者，能跑的被趕出了大陸，或退守在海外孤島或流落到異國他鄉；不能跑的則被打入了社會底層，或在幾年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補殺，或長期被戴上「四類分子」帽子接受監管，每逢政治運動都要被拉出來批鬥一番，故已不可能再堂而皇之地爬起來制約這個新興的政權。

其二，在這一政權「暴興」起來後，其執政黨的新政敵即各種新生反對派組織，都夭折於初創時期，沒有一個能發展成全國性組織、能達到大政黨

水平，故都不可能對它形成有效制約力。

毛澤東政權將任何獨立於它的政治組織，不論它們是否採取和平表達方式，都視為非法團體或反動組織，都予以嚴厲懲處，都通常要將其首要者處以極刑。在共和國的嚴刑峻法中，「反革命組織罪」是一切罪中之最。

這是把國民黨曾用以處置自己的方法拿過來再用以處置別人。國民黨過去怎樣對待共產黨，共產黨今天也怎樣對待它的反對派組織。這似是應了毛常愛說的那句老話：對待反動派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但實是「以張三之道還治李四之身」。中共執政前的對手與其執政後的對手是不同的，分屬張三李四兩類人。前者是世仇，曾殺共產黨無數，可謂血債累累。後者是新生反對者，未傷害過執政黨，沒有歷史積怨。如今執政黨不分前者後者，一律予以徹底封殺。

事實上，這一政權不僅深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道理，而且做到「青出於藍勝於藍」的境地。以往國民黨只是在共產黨發展到相當大規模、幾乎與它並駕齊驅時才公然反目，大打出手。如今毛澤東政權就不會等到它的反對派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再動手，而是當其一露萌芽就予以鏟除。建國數十年來，沒有哪一個反對黨組織能夠發展到共產黨當年與國民黨分裂時(1927年)的水平，甚至達不到它最初與國民黨合作時(1924年)的水平。換句話說，沒有哪一個反對黨組織能夠發展到使執政黨感到受其制約的水平。

也正因此，人們可以說現代中國大陸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現代中國大陸執政黨也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現代意義上的政治講寬容，講多黨和平競爭，最忌一黨專政。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家講尊重對手，承認對手也享有自己所享有的一切權利，故所追求的成功是以公平競爭為前提的成功。比如，他們之所以能夠獲得較多的聽眾，只是因為他們比對手表達得好，而不是因為他們捂住了對手的嘴巴。可是在毛澤東及其繼承者那裡，還沒有人沒幹過捂別人嘴巴這類醜事。

從這裡可看出，毛澤東搞政治的心胸是十分狹隘的。他擁有的就不准別人再擁有，他做過的就不准別人再做一遍。他是搞小組組織起家的，先搞小組

織，繼搞大團體，最後搞成執政黨，故深諳政治組織的運作技巧，深知政治組織所可能蘊藏的巨大能量。爲此，他很鍾愛他的黨，並引以爲自豪，稱之爲「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sup>1</sup>；但不能容忍別人也來發展組織，也來以組織力量與他分庭抗禮。

先秦時，墨子聽說有一個叫駱滑厘的人很「好勇」，便去詢問究竟。駱勇士答道：我只要聽說什麼地方有勇士，就一定趕去把他殺了。墨先生聽後不禁感嘆：天下人莫不是揚其所好、抑其所惡，可駱某如此行事怎麼能說是「好勇」呢？只能說是「惡勇」。（〈墨子·耕柱〉）即是說，這個所謂的「勇士」，並不真正崇尚勇敢，而是十分厭惡勇敢；這種所謂的「勇」建立在對勇的否定上，故是一種具有強烈排他性的勇，一種不能容忍勇的勇。

老人家與駱勇士很有些相似。他善於經營組織，但不容忍別人也來經營組織。他頗能堅持自己的觀點，但不容忍別人也來堅持自己的觀點。他盛讚他的黨人能夠英勇不屈，但不容忍他的對手也能夠威武不屈。國民黨的劊子手還允許一些臨刑的共產黨員高呼革命口號，但毛澤東的執法隊決不讓那些臨刑的不屈者說出一個字來，爲此，竟去割其喉管（張志新，遼寧，1974年）、縫其嘴唇（史雲峰，長春，1976年）、用竹籤穿連其下顎與舌頭（李九蓮，江西，1977年<sup>2</sup>）。在他這裡，缺少的是尊重對手的君子氣度，缺少的是惺惺相惜的勇者情懷。

總之，毛澤東政權不論在其「暴興」過程中，還是在其「暴興」起來後，都把其政敵——不論作爲「歷史反革命」的老國民黨，還是作爲「現行反革命」的新反對派組織——清理得比較乾淨，從而使它在幾十年裡從未受到過來自這方面的有效制約。

1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頁133。

2 張書紳，〈正氣歌〉，載《鴨綠江》，1979年第5期；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國文聯出版公司、新華出版社，1998年），頁161-172。

## 5

上述情況連帶出一個問題：這種缺乏反對黨制約的政治統治將有什麼樣的歷史後果呢？若闢開民族整體利益視角，僅就執政黨自身利益來說，這種政治統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終弊大於利，即促使其由「暴興」向「速衰」轉變。

同事相告：北京街頭有位賣冰棍的老太太，閒來無事與路人聊天，說「共產黨比國民黨能耐多了，像現在這樣的腐敗，攔在老蔣身上早就讓他垮了，攔在老共身上什麼事也沒有，江山照樣坐，腐敗還有著搞囉。」老人家出語不凡，三言兩語就把我們的問題給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這種政治統治既較穩定又易腐敗的兩重性質。

人們會問，為什麼這樣的腐敗能讓老蔣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簡單：因為，老蔣身旁有一個強大的虎視眈眈的共產黨，所以他不能犯嚴重錯誤，否則就會被取而代之，事實發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邊則不存在任何能夠趕它下台的反對黨，不存在任何有分量的獨立政治勢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錯誤，也很難被逐出統治者的位子。

然而沒有強大的反對黨，在短時間內確能給執政者帶來某種政治穩定，但長此以往就會給執政者帶來難於克服的腐敗傾向。前者可視其利處，如老太太所說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後者則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說的「腐敗還有得著搞囉」，即腐而不治。兩者相比，後者更根本些，因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終決定執政黨命運的。

這種難於克服的腐敗傾向至少有兩方面表現：

其一，由於缺乏反對黨制約而導致執政黨在施政舉措上為所欲為。

孟德斯鳩曾從權力結構關係角度指出，那種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什麼樣的壞事都能幹的權力。同理，我們也可從政黨互動關係角度指

出，那種不受其他政黨制約的政黨，也是一種什麼樣的錯誤都能犯的政黨。

一個政黨尤其是一個執掌國家權力的政黨，爲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爲，就應該把自己置於某些壓力之下、置於某種警鐘長鳴而不敢懈怠的氛圍之中。這其間最有效的壓力，當是來自那些時刻想把執政黨拉下來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對黨。試想你身邊有一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撲過來的傢伙在那兒躍躍欲試，你還敢打盹嗎？試想你周圍有一些心懷敵意到處尋找你弱點的對手在那兒探頭探腦，你還敢隨便犯錯誤嗎？尤其是還敢一個勁地犯同樣錯誤嗎？

一個政黨是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亞里斯多德常提到的斯巴達人，四面受敵，卻不設城牆，從而把自己置於一種危境、一種稍有不慎便有滅頂之災的危境。這就迫使他們時時刻刻保持著高度的緊張，保持著臨戰的狀態。警覺的眼睛、出鞘的刀劍是斯巴達人最好的城牆，並使他們一度稱雄希臘。儘管斯巴達人崇尚暴力且好於征戰的舉動不爲亞里斯多德肯定，但他們這種置危境而自強的精神倒可以爲後人借鑑。

因此，有反對黨制約對執政黨來說並非是件壞事，反倒能迫使後者在行使國家權力時必須小心謹慎、克盡厥職，尤其能迫使後者在處理重大事務時必須承受那種「一著不贏，全盤即輸」的壓力。咄咄逼人的政敵不會讓你擁有許多次犯錯誤的機會，只要抓住你的一兩個大錯誤就足以將你趕下台去。在此情勢下，執政者們還敢驕矜、還敢懈怠？還敢像毛澤東那樣玩兒似地把偌大個國家拿在手裡翻來覆去？

毛澤東政權根本就沒有像樣的反對黨，也就沒有上述那種壓力。它的老政敵被解放軍消滅了，它的新政敵被公安機關取締了。它似乎有了一個無人來顛覆的鐵打的江山。不過，這種情況對它來說未必是件好事。沒有壓力，也就不嚴格要求自己了；沒有監督，也就不必去循規蹈矩了；沒有畏懼，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鐵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許多鐵打的錯誤。

由於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夠取代自己，毛澤東也就不在乎屢犯錯誤，甚至不在乎屢犯大錯誤。像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人爲大饑荒，像導致整個民族

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攔在任何民主國家裡都會使執政者下台，因為反對黨要追究它滅絕人類罪和滅絕文化罪；但在毛的國家裡絲毫不影響他的統治地位，因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夠藉此發難的政治勢力。

令人十分詫異，執政者們把常犯大錯誤說成是「交學費」，吃一塹長一智，壞事變好事。他們竟能在煙波浩淼的漢語詞海中找出這麼個好詞來。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過於送孩子上學堂，交一些學費，長許多見識，並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這詞，執政黨犯大錯誤也就被說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學費，就不會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學堂就得年年交。換作執政黨話，今年犯錯誤，明年犯錯誤，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錯誤。不過，從長遠來看，執政黨因犯大錯誤而交出的東西，不是什麼學費，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於缺乏黨派競爭而導致執政黨在運作能力上急劇退化。

在生物發展過程中，當來自環境方面的某種生存壓力開始減弱乃至消失時，生物體中原先具有的那種用以應付這種壓力的生存能力也會相應發生退化。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人的體力勞動逐漸為腦力勞動所替代時，人的體能也在發生變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壓、心臟病和肥胖症等。

不過，人並非完全被動地適應環境方面的變化。比如，面對上述勞動方式的變化，許多人積極從事體育運動，甚至參加體育比賽，有意識地向自己的體能施加壓力，要求自身必須具備較大的承負力量和較快的運動速度。為了應對這種壓力，人們通過艱苦鍛鍊而予以適應，進而維持乃至增進自己的體能。

同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當反對黨完全消失時，執政黨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種應付政治挑戰的生存能力也會隨之發生退化。消除政敵與弱化自身抗衡政敵的能力，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因此，那種完全排斥政治異己力量的一黨專政體制，表面看是便宜了執政黨，實際上是寵壞了執政黨，弱化了執政黨執掌國家權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執政黨就必須把自己放在與反對黨持續競

爭的位置上，放在後者不斷給予的壓力下。這就像上述爲了防止體能退化而把身體投入到體育運動中以承受各種生理壓力一樣。一個最切近例證，就是台灣執政黨一方面因開放黨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也因開放黨禁而獲得相應的承受能力。國民黨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澤東的國家裡，執政黨不屑於同反對黨進行政治競爭，也根本不允許有這種競爭發生。長此以往，執政黨也就漸漸不知什麼叫反對意見、什麼叫政治壓力了，故而變得驕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國人的話裡，驕傲一詞總是與退步一詞連在一起的。執政者愈是自以爲是，其執政能力愈是退化。

執政者們漸漸變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來了。他們說得很好，做得卻很一般，甚至很有問題。

由於沒有政敵能夠有效地督察他們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們喜歡許諾、喜歡講大話。由於又沒有政敵能夠有效地詰難他們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們愛把自己的許諾和大話編成童話般的東西。例如，他們曾作過這樣一些很能打動人的許諾：

大約五十到七十年左右即十個到十五個五年計畫左右，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五十年以後會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sup>1</sup>。(1955年毛澤東語)

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sup>2</sup>。(1957年毛澤東語)

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這裡主

---

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04。

2 同前註，頁105。

要是鋼。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sup>3</sup>。

(1958年毛澤東語)

爭取五年內實現社會風氣和黨風的根本好轉。(1982年中共十二大

政治報告用語)

幾乎每一次所謂「繼往開來」的大會，總有那麼幾句老話：過去，缺點是次要的，成績是主要的；未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誠然，人們不應一概而論地反對許諾、反對用美好的希望來振奮精神，但人們必須反對輕率的許諾、反對許諾者在許諾應該兌現時卻裝出一副什麼也沒說過的樣子。其實，人的一些許諾真要是沒有兌現的話，也不都是什麼了不得或過不去的事，因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難，不是樣樣都能說到做到。問題是許諾者不論做成了還是沒做成他所許諾的事，總得給他所許諾的人一個交代、一個認認真真的說法。

志過大、眼過高，也就顯得才過疏、手過低了。毛澤東號召億萬農民多產糧食，可自己並不清楚一畝地究竟能產多少糧，有意無意地誘發了一顆顆畝產萬斤糧的「衛星」。他又號召全國人民大辦鋼鐵，可自己也並不清楚那些土製小平爐小高爐究竟有什麼樣的技術參數，結果與其口號相伴生的是千百萬噸鋼渣鐵渣。他想搞「大躍進」運動，卻不具備現代生產知識，同時又沒有反對黨來潑他的冷水，來敲打他、奚落他。這就使他越發自以為是且一意孤行起來了，最終把「大躍進」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開放後，第二代執政者也同樣由於缺乏制約和競爭而表現出某些志大才疏的品質來。他們關於改革的設想大多屬原則性的、口號性的，很少附有較具體、較精當的實施方案。並且，他們的許多改革設想並不是自己原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頁699-700、頁702。

的，而是取之於他人的，僅是對老百姓已有的改革願望以及改革實踐的一種順應和認可。例如，作為中國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制，就是由農民自己創設的，而那些領導者們只是在當時沒有反對在事後予以肯定而已。

他們被稱作「設計師」，其實在許多方面倒像是「啦啦隊」加「督戰隊」。他們先是拄著拐杖，敲著地面，大聲吆喝著別人朝前跑、加油跑，至於別人怎樣跑、採取什麼具體方法，那是他們的事。「啦啦隊」管不了這些問題。他們後來發現這些人跑得不如他們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掄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責怪他胡跑一氣。「督戰隊」不能不顯示威嚴。你們跑得好，是因為我督導有方，功勞在我；跑得不好，是因為你們不聽話，過失在你們。我是大權獨攬且責任不負。

不過，話說回來，要求那些八、九十歲的「設計師」們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們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體策略，似是過於嚴厲了，似是缺乏對於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為，年紀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權力的人，這是歷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才能的人，這是「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的。傍晚六、七點鐘的太陽總不會比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更有朝氣，也不會比中午十二點鐘的太陽更顯輝煌。否則的話，就是在對抗自然法則了，就是在嘲笑我們這個曾經偉大過的民族，如今成了一個只是在天將黑時才顯出迷人景色的夕陽民族。

問題是，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要這樣累著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們這個有著尊老傳統的民族為什麼要這樣不照顧這些老人家呢？為什麼要讓他們東顛西跑指手畫腳而不回家安養天年呢？

這原因恐怕還是出在體制上，出在一黨專政上。由於沒有真正的政治競爭，沒有能取代他們的政敵，故使得這些老人們能夠順理成章地占著位子不讓。由於又沒有真正的制度約束，沒有能管著他們的法規，故又使得這些老人們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運作國家機器，並因此而使政權行為蒙上濃厚的老人色彩：言語嘟嘟囔囔，舉止哆哆嗦嗦，說不清楚，做不穩當。

沒有反對黨的威脅，執政者的位子總是好坐的。中國史上那些至高無上

的龍椅中，安坐過許許多多老態龍鍾的人，以及許許多多由老人們抱上去的無知寡能、呆頭傻腦的人。

這種因缺乏黨派競爭而導致統治能力退化的情況，突出地表現在執政者的一些經濟作為中和一些政治作為中。

例如，在搞大規模經濟建設上，常常是虎頭蛇尾，形成了一種姑且叫做「打擺子」的模式：先是發熱，高燒40度C，大幹趕上，上速度，上規模，恨不得馬上實現共產主義，馬上實現現代化；接下來便是發冷，渾身打冷戰、大砍驟減，減規模、減速度，項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蓋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年的「大躍進」，開始時說有多熱就有多熱，什麼口號也敢喊，什麼指標也敢訂；三年後說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數千萬，財產丟了上千億，整個經濟非但沒有「大躍進」，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經濟發展仍未能完全擺脫這種「打擺子」模式。溫差較大的「擺子」至少發作了三次：1984年發熱，1985年發冷；1988年躁動，1989年寒顫；1992年又膨脹，1993年再緊縮。

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腦子來看著走、想著走，而是通過撞在樹上、跌到地下覺著疼了再調整方向接著走。這種通過疼痛感來調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類似軟體動物僅根據觸摸感而作出蠕動的前行方式，顯現了一種不怎麼高級的生存能力。

又如，在處理突發性政治事件上，毛的執政黨也常常手忙腳亂，缺乏應變能力；常常將小事鬧大，將大事鬧砸，將動嘴動舌的事鬧成動棍動棒的事乃至動槍動彈的事。

1976年的「四·五運動」，以言論開始而以棍棒結束。1989年的「政治風波」，則更進一層，以暢所欲言開幕，以槍彈橫飛收場，老百姓死傷無數，長安街血跡斑斑。前者是在毛活著的時候發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處理的。後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創設的那種不受制約的國家機器仍在運轉的情況下發生的，是由與他權力角色相仿的那種說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

的。後者鬧得規模更大，其間所顯示出的政治應變能力也更難讓人恭維。

若撇開政治傾向不說、僅就應變能力而言，此時執政者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只做了早年許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幹成的事情。1927年，為鎮壓以工會農會名義組織起來的並用砍刀梭標半武裝起來的長沙工農群眾，許克祥只用了一個團的湘軍。1989年，為彈壓既無組織又無武裝的北京市民，掌權者竟調動十幾個番號的野戰軍，乘裝甲車入城，用自動槍開路。

這是盡用天下雄兵對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無足以稱道，卻被事主說成是威武之師的壯舉。說者不覺顏面發燒，聽者倒是滿臉通紅了。俗話說，天底下最怕兩種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臉的。「八九風波」同時成全了這兩種人。

再說對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動用一般武裝力量，便綽綽有餘了，可是這次一開始就動用像38軍這樣的王牌軍，似是濫用軍力。

此38軍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國共戰爭時由彭德懷統領的紅三軍團，彭軍團向以善打硬仗著稱。抗日戰爭時，該部隸屬八路軍主力師115師，是其基幹部隊。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該部隸屬由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軍，是其「第一主力」。朝鮮戰爭時，該部又因其戰場表現而被彭老總呼之為「萬歲軍」。這是一支戰功卓著的部隊，堪稱中共武裝力量的精華。

一般來說，善用兵者不輕易動用主力部隊，如林彪在遼沈戰役打錦州時，就將38軍(時稱第一縱隊)留置高橋待命，以作戰役預備隊，打算用在最後關頭。又如彭德懷在朝鮮戰爭轉入僵持階段時，便將38軍撤到後方休整，以作戰略預備隊，也打算用在最後關頭。

可是，1989年的主事者一開始就用上了王牌軍，並用它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這如同打牌一開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並打得不守章法。這是在用王牌軍打爛仗，打有損軍威的仗。處理「八九風波」的領導人主要是部隊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軍隊統帥出身，故多從政治功利情況考慮，而不能像彭德懷、林彪那樣多從軍隊自身情況考慮，不能像他們那樣慎用軍隊主力，愛惜王牌軍榮譽。

據說那些主事者們善於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麼樣，牌技不高，牌風不正，最後連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講道理，你卻大打出手。不論人家講得怎樣，只要你一動粗手就輸了理。這表明你：或是不敢講道理，理虧得很，即「德」有問題；或是講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問題。

執政黨曾經是一支很富有獻身精神、很富有戰鬥力的隊伍，出過許多英烈、有過許多勝利；如今則變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間假公濟私者比比皆是、平庸無能者處處可見。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有國民黨對它制約，有各種政治勢力與它競爭，故使它不得不竭盡全力行事。後來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敵，暴力統治又替它取締了新的政敵，故使它處於一種既無強敵對之制約又無強敵與之競爭的境地，進而使其生存能力漸趨退化。

這就像那些土豆一樣，在氣候寒冷的北方長得碩大而多有光澤，移栽到氣候溫暖的南方反而長得瘦小而多有疤痕，並且一代不如一代。

## 6

毛澤東政權既然不能獲得政敵方面的有效制約，那麼能否獲得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約呢？政敵不能給予，盟友能否補償呢？

答案也是否定的。政敵即所謂各種「反動勢力」不能制約它，盟友即所謂各個「民主黨派」也不能制約它。

當然其間也有不同；前者一開始就被判為非法存在，被嚴禁在政治上亂說亂動；後者一開始則被邀請來參與政事，被允許對執政黨評頭論足。人們從前者境遇中，可看到統治者明正典刑；從後者境遇中，則可看到老朋友言而無信。對於毛澤東來說，讓民主黨派來監督自己，不過是講講而已間或笑笑而已的事。

如果說毛澤東一上台就跟老朋友翻臉，似是冤枉他。據其衛士回憶，毛是一個很念舊的人，對騎過的馬使用過的茶缸都有些感情，都不輕易更換。對馬對茶缸尚且如此，對人尤其對那些曾冒著「通匪」罪名幫過自己的人就更應如此了。事實上，他剛進北京時是很善待老友，說了許多不忘舊情的話，做了許多善解人意的事，與他們纏纏綿綿地過了一段政治蜜月時期。

1950年6月，毛在政協一大二次會議上說了一段頗使老朋友感到舒心的話：「只要誰肯真正為人民效力，在人民還有困難的時期內確實幫了忙，做了好事，並且是一貫地做下去，並不半途而廢，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sup>1</sup>他是在告訴老朋友，我毛澤東不會不給你們飯吃，也不會不給你們事做。

當時，毛和他的黨的確為老朋友們安排了許多重要職務。在中央政府人

---

1 毛澤東，〈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頁416-417。

選中，民主人士約占1/3；其中有3位民主人士擔任中央政府副主席，有14位民主人士擔任政務院委員和副總理，有26位民主人士擔任21個部的部長和副部長。

然而，毛對老朋友的還情、對民主黨派的禮讓，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不會允許這些民主黨派掌握過多過重的政治權力，以致影響自己的統治地位；不會容忍這種政治蜜月沒完沒了地持續下去，以致壓抑自己原本就好爭吵的政治秉性。

大多數民主人士被安排在政治協商會議中。這個會議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一度具有最高權力機關性質，曾制定出國家臨時憲章——《共同綱領》，曾組建起國家最高行政機構——中央人民政府；但到了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後，便逐漸退為榮譽性咨議機構，其成員不再擁有政治拍板權，僅享有在國家舉行重大禮儀活動時榮坐前排的權利，有時也可對政府舉措發一些議論，但這些議論不能發到執政者的心痛處。

至於那些進入政府權力機關的民主人士，多數任副職，如任副主席、副總理、副部長等職；少數任正職，如任教育部長、水利部長、輕工業部長等職。在這個一黨專政體制中，每個單位的行政首長都沒有「黨委書記」大，並且每個單位的下屬部門頭頭也大多是「黨員幹部」。因此，那些民主人士出身的行政領導在行使職權時，總是要謙恭且小聲地與書記商量，總是要客氣且輕聲地向部屬諮詢；每逢單位黨組織開會決定重大事情時，或只能若有所失地徘徊門外，或只能寡言少語地列席會議。

那麼，在這個由共產黨最後說了算的國家裡，民主黨派究竟是什麼樣的政團？究竟能做什麼樣的事情、能有什麼樣的作為？

這涉及到民主黨派的政治定位問題和運作方式問題。

對於這些民主黨派，人們很難直接肯定它是什麼，但可以直接說它不是什麼，進而間接確認它是什麼。從總體上看，這些民主黨派既不完全是體制外的反對派，也不真正是體制內的實權派，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並兼有兩者部分性質的政治派別。

毛澤東一方面說：「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沒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沒有理由不給他以生活的機會和效力的機會的」；一方面又說：「所有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表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實際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對派……他們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常常由反對走到不反對。」<sup>2</sup>

對於執政黨來說，民主黨派既不是陌生人，也不是家裡人，而是遠房的親戚；因而既不能拒之門外，又不願予以厚待，遠不得，近不得，很不好處。如果只是站在門口寒暄寒暄，主人倒不反對，但客人就不高興了，大老遠地跑來只能站在那裡空著肚子說空話，總不免有些難看。如果真要迎到屋裡給吃給喝，客人倒很滿意，可主人就不自在了，辛辛苦苦掙來的或用血用命換來的家當讓別人消受總不免有些心疼。

建國初期，毛澤東對待民主黨派很是熱情，隔三差五總要聚一聚，什麼好聽的話兒都能說出來，什麼好看的東西都能端出來，有時還搭送點貴重禮品，如搭送了三頂「國家副主席」帽子和兩頂「政務院副總理」帽子。

可是，相處時間一長，兩者關係就起了變化，有了許多矛盾。大家總不能老是歡坐在那裡推杯換盞盡說些相見恨晚的話，總得要站起身來忙著做事過日子；而要過日子就難免有磕鍋碰碗、燒鹹了煮淡了的是是非非，就難免有幹多幹少、你肥了我瘦了的恩恩怨怨。客人方面，可能會抱怨主人有些薄氣，沒有盡做主人的義務，如1953年梁漱溟就曾牢騷滿腹地抱怨毛澤東缺少當大家長的「雅量」，聽不得不同意見。主人方面，也可能會埋怨客人有些過分，沒有守做客人的規矩。如1957年執政黨就曾火冒三丈地斥責一些民主黨派居然想在別人屋簷下搞什麼「輪流坐莊」，不曉得自己站在哪裡、同誰在說話。

不過，雙方一旦鬧起矛盾來，各自遭遇就大不一樣了。實力的不對稱自是導致結局的不對稱。客人方面僅僅對主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滿，並僅僅用言

2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79。

辭來表示這種不滿，即所謂「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主人方面則不僅對客人所做的事表示不滿，如把「向黨提意見」看做「向黨進攻」；而且對客人在屋裡的存在表示不滿，即要把他們吆喝出屋、掃地出門，或下放基層、或送去「勞改」。

客人只是向主人提提意見、鬧鬧情緒。主人則是對客人極不耐煩、大加發作、拍桌子摔板凳、抽耳光踢屁股。1953年批梁漱溟，可看做是毛澤東對個別民主人士的不耐煩和大發作。1957年反右派，可看做是毛澤東對整個民主黨派的不耐煩和大發作。

於是昔日老友、遠房親戚，曾經被熱情迎進門、此時又被冷臉送出門。他們本是去看朋友或走親戚的，小住一下無妨，久住下去就不妥當了，就要討人家嫌棄了。

當然，事情不是絕對的，真要想久住下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只是這些遠房的親戚必須放下客人的架子，脫下袍子，挽上袖子，做起諸如端茶倒水之類的事來。大戶人家總得要有一些能夠跑前跑後張羅門面的人。問題是人和人不一樣。有一些人確有這方面的才能和耐性，幹得十分出彩，並一幹數十年。每逢主人家舉行重大禮儀活動，人們總能看到他們恭恭敬敬地站在最顯眼處，打躬作揖，唱喏問安，抬頭見笑，低首有禮，一副討人喜歡的模樣。另一些人就沒有這做伙計的天賦了，不會打躬作揖，不會道喜問安，說話不分場合，行事不看臉色。大戶人家的房前屋後廳裡堂外容不了這後一種人，自是要請其走人的。

民主黨派作為遠房親戚而客居執政黨家裡這一隱喻，包含兩個清晰度不同的層面：一是實質上的利害關係，非常清晰，主客分明，乃至主僕分明；二是表面上的應酬關係，不甚清晰，主客間稱兄道弟，互比一家，主人好客地說請把我的府第當做你的家，客人也知趣地說：「人在貴府裡猶如身在自家中。」

正因為有了這兩個層次，也就有了兩者間相互遮掩相互混淆的可能。事實也是如此，第二層次關係常常遮掩了第一層次關係，那些客客氣氣應酬話

常常使人們不能清晰地區分主與客、內與外，從而生出許多困惑。

例如，人們很難理解毛澤東對民主人士怎麼能夠說翻臉就翻臉，一下子從客客氣氣變為怒氣沖沖。這種不理解實是執迷於第二層次應酬關係，即主人應該善待客人；而沒有看破第一層次實質關係，即客人畢竟是客人，住久了而又放不下架子做僕人，致使主人膩了且又忍了許久，於是乎，不發作則已，一發作就不可收拾了。

又如，人們很難理解某些民主人士好心好意給執政者提意見反被潑了一盆涼水，從頭潑到腳，從外涼到裡。這種不理解也是執迷於第二層關係而失之於第一層關係，只是覺著老弟好意忠告老兄，老兄則應禮遇老弟；而沒看到老弟雖是老弟，但只是遠房的表老弟，來到此家打個下手混碗飯吃就不錯了，卻還不知足，還要反客為主，就這屋子裡的事情指手畫腳起來，開始時主人礙於禮面謙讓了一下，而他居然當真，越說越起勁，說到末了能有他好果子吃？

## 7

總體上看，民主黨派的政治運作方式，主要表現為言論運作方式；與此相應，民主黨派的人員公務職守，也大都被安排在「言官」位置上。大多數進入「政協」的民主人士，主要從事咨議性工作。另一些擔任政府行政領導職務的民主人士，也主要在「黨委一元化領導」下參與議論本部門工作。我們已經指出民主黨派不是什麼，不是政權外的「反對派」，也不是政權內的「實權派」。我們還要指出它是什麼，指出它是一種介於「反對派」與「實權派」之間的「言論派」，持言論而立世。那麼，民主黨派的言論究竟有多大價值、有何種意義？具體地說，有何種預期意義？有何種實際意義？

關於預期意義，可分別從民主黨派和執政黨兩方面看。

民主黨派對自己言論參政的預期，往低處說，即從黨派私交上說，想通過發議論方式，來幫助老朋友管好這個大國家；往高處說，即從民族大義上說，不管什麼人執政，只要造福人民就褒之，只要為害人民就貶之，有錯必究，不平則鳴。民主黨派很想通過他們的言論來影響新中國的政治。

執政黨把民主黨派置於言官地位也有所預期，也有低處著眼高處著想兩層預期，一為「還情」，二為「納諫」。

中共打天下時，曾得到過民主黨派大力協助，欠了他們許多情分。1920年，毛澤東賣掉大衣買了一張車票來到上海，最初在洗衣店當伙計，洗洗涮涮，收入甚微。就在此人一貧如「洗」之際，前教育總長章士釗先生領銜為湖南青年團體籌到2萬塊大洋，交由毛轉遞。這可能是他從記事到此時所看到的最大一筆款子。1938年，八路軍前與日軍作戰而消耗甚多，後有老蔣苛刻而補充甚少。就在該軍十分困窘之際，國軍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冒著老蔣要追究的風險，一次性批給八路軍一百萬發子彈和25萬顆手榴彈。這可能是中共自建軍以來獲得的最大一筆軍火。

1945年，中共參加重慶談判是捏著一把汗的。首先，談判的實力不如對方。當時在中國發言權的大小主要取決於槍桿子的多少，而中共軍隊無論在人數上還是在裝備上都處於劣勢地位。其次，談判的桌子擺在人家地盤上。對方能夠嚴密監控會議進程，隨時都有可能置己方於尷尬境地。窘迫的中共急切需要其他政治勢力支持，以抗衡正處於鼎盛期的國民黨。

結果，如願得到支持。老蔣把老毛看作是想來討便宜的匪黨頭子，民主黨派則把他當做是前來談和平的光榮使者，儘管後者已做好種種打的準備。他們傾巢出動地為他迎來送往，使之倍感榮耀。他們還為中共出謀畫策，如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主席張瀾先生與毛澤東私下商議，以自己名義發表文章來說出後者很想說卻不便說的話，使得毛大為感激，讚其「老成謀國」。

民主人士很清楚，好記仇的蔣先生正用冷冷的眼光，注視著他們做的一切，遲早要給他們一些顏色看看。第二年秋冬之際，國軍攻占共軍在關內所擁有的最後一座大城市張家口，國民黨旋即召開「國大」，遂將絕大多數民主黨派逐出國家議事機關，此後還讓特務們不時找這些失業政治家的麻煩。不管後人怎麼說，不管中共黨史怎麼寫，民主黨派曾在毛澤東很需要幫助時幫助了他，既給了他一些實惠，又給了他很大面子，並為此而付出一定代價。

1949年，中共一坐上執政者位子，就要對老朋友作出回報。蔣先生把這些人逐出「國大」，使他們成了政治盲流；毛先生則把這些人請進「政協」，讓他們一有飯可吃、二有話可說、三有榮譽可享，以還他們一些舊情。

不過，毛澤東設置言官的預期還不止於此。他畢竟屬政治家，很有功利感，不僅想藉此還上舊有情分，還想藉此獲取現實好處，希望言官們能夠對新生政權有所貢獻，提出一些建國良策。毛澤東待客，不只是盡情分，還想從客人身上索取於己有益的東西。做客人掌握好分寸，在身分上不能反客為主，在言辭上不能過於激烈，尤其碰上氣度不大的主人就更不能自以為是地說話；那麼，做主人的還是願意聽一聽客人的意見，嘗試一下納諫的好處。

自唐貞觀以降，凡想做一番事業的統治者，總要附庸風雅一下李世民的納諫之舉。毛澤東也不例外，也曾表現出這一雅興來。他熟讀史書，知曉「兼

聽則明，偏聽則暗」的古訓，知曉太宗皇帝「常保三鏡」<sup>1</sup>的故事，不會不明白一個政權若想少犯錯誤，就需要傾聽不同的聲音，尤其要傾聽批評的聲音。爲此，他作了這樣的承諾：

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爲什麼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爲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sup>2</sup>。

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像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sup>3</sup>。

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雲、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sup>4</sup>。

顯然，毛澤東最初是想廣開言路以資其政，但他最終沒有做到這一點。因此，我們既不能用他先前的良好願望來開脫他後來的實際錯誤，像現在許多官樣文章所說的那樣；也不能完全反過來說，說他原本就沒有絲毫誠意。

1 「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出於《舊唐書》，卷71。

2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94。

3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55。

4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279。

## 8

對於民主黨派以言論參政的方式，不論他們自己還是執政黨都從各自角度表示了良好的願望。那麼，這種願望如何進入實際過程、如何獲得實際意義呢？

一般說來，言論參政方式有兩種：一是參議政府舉措前的決策，二是評說政府舉措後的得失。就民主黨派的政治實踐看，前一種方式很難實行，後一種方式很受限制。

執政黨做重大決策的基本程序是，先關起門來想、關起門來議，由毛澤東腦袋到常委會、到政治局、再到中央全會；等想好了、議好了，再告知民主黨派，做徵詢意見狀。實質上是我說了算，形式上是我與你協商。

1954年前，先由「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後經「全國政協」議論通過。1954年後，先由「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後經「全國人大」鼓掌通過，再讓「全國政協」附議贊成。此時「政協」已由二等表決機構降為三等表決機構，不僅察顏觀色於「中共中央」，而且隨聲附和於「全國人大」。於是乎，這些身著西裝革履、長袍大褂的「政協委員」們，也跟著那些身著軍裝工農服、一身短打扮的「人大代表」們一起，頻頻舉手，陣陣歡呼。

毛澤東執政二十幾年，作過這樣一些重大決策：

一、1950年決定出兵朝鮮。這是有關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如何定位的重大決策，即決定新中國武裝對抗「美帝國主義」、並堅決倒向蘇聯陣營。

二、1955年決定加快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這是有關新中國在

社會制度上如何定性的重大決策，即決定新中國由容忍民族資本主義的「和平民主新階段」迅速過渡到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階段」。

三、決定搞「大躍進」。這是毛澤東在經濟實踐上所作出的最重大決策，其後果也最嚴重。

四、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是毛澤東在政治實踐上所作出的最重大決策，其影響也最深遠。

對於這些重大決策，民主黨派是很難參議上的。

關於出兵朝鮮決策，不要說是民主黨派人士，就是執政黨大多數中央委員也未能參議。它先由毛澤東下決心後由十幾個政治局委員附議而作出的。

關於加快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決策，毛澤東曾說明：「出這麼一點錢，就買了這樣一個階級。這個政策，中央是仔細考慮過的。資本家加上跟他們有聯繫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文化技術知識一般比較高。我們把這個階級買過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使他們無話可講。剝的辦法，一個是出錢買，一個是安排，給他們事做。這樣，政治資本就不在他們手裡，而在我們手裡，我們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沒有剝奪乾淨的還要剝。」<sup>1</sup>

這是毛澤東在各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對自家人講的私房話，道出執政黨做此決策的真實意圖，即要抽掉民主黨派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進而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顯然，執政黨不會讓民主黨派預知這一決策，而民主黨派也不會真心贊成或積極參議這一極大損害他們自身利益的決策。

至於後兩個重大決策，由於都發生在將民主黨派發言權剝奪殆盡的「反

<sup>1</sup> 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37。

右運動」後，因而也都不存在讓他們來參議的可能性。過去執政黨做決策還在形式上向民主黨派打個招呼，此時連這形式也不需要了。像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的事，連執政黨副主席也是國家主席劉少奇都不能預知，至於民主黨派就更不能說上話了。

關於民主黨派言論參政第二個方面，即評說政府舉措後的得失，由於是發事後議論，因而與事前參議相比，雖在認識上容易些，但在政治上更有風險些，更不討人喜歡些。事前參議只是告誡人家將會生病，事後議論則是硬揭人家已有傷疤。執政者們常常不理睬前者，但很想懲罰後者。

1953年9月，梁漱溟先生對執政黨在農業方面的舉措提出善意且委婉的批評，但不能容於毛澤東，結果被封上了嘴巴，很愛說話的人在二十餘年間不能說話。

1954年7月，胡風先生向執政黨中央提交一份報告，談了自己對新中國文藝工作的看法以及自己受排擠的境況。報告既不否定黨的根本路線，只對黨的某些政策提出異見；也不攻擊黨的最高領導，只對黨的宣傳部門負責人表示不滿。結果胡風引火燒身。1955年1月，執政黨中央將胡風意見定性為反黨文藝思想，並發動全國知識界予以批判；5月，執政黨中央又將胡風與其支持者由「文藝上的小集團」升格為「反革命集團」，並將胡風本人捕入獄中；6月，執政黨中央拋出由毛澤東作序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胡案遂成鐵案。1965年，胡風在坐了十年牢後被假釋出獄；1969年，胡風被加判無期徒刑，再次被關押，服刑近十年；1980年，胡風獲不徹底平反；1988年，胡風在去世三年後獲徹底平反。

嚴格說來，胡風不屬於民主黨派，而是中共老黨員、魯迅先生最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執政黨懲處胡風也可以說是在殺雞儆猴，有意無意地告訴民主黨派，若冒犯本黨威儀，即便自家兄弟也要嚴懲不貸，至於你們這些遠房表兄弟就更不要抱什麼僥倖心理了。

可是，民主黨派仍不接受告誡，仍要說出自己想說的話。1957年春夏之際，他們也言辭激烈地批評起執政黨來，結果也招致後者強烈反彈。先後有

數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另外還有更多知識分子因此而失語。過去，只是個別民主人士因言獲罪；如今，則是整個民主黨派在言論上全軍覆沒。此後，他們就由好說者變為無話者、由善談者變為訥言者，他們原被允許使用的言論參政手段，雖還能在一些禮儀性場合被提起，但已是名存實亡了。

許多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事前不是不清楚他們的言論是要捅馬蜂窩的，但還是忍不住要說出來，要讓那些妄自尊大的執政者們不得開心顏。這裡體現了一種文化傳統，即許多中國優秀知識分子所遵循的「士志於道」傳統。他們積極入世、關心時勢，但由於處在最高決策圈外，很難介入到有關國家大政方針的事前參議中，故只能較多地關注它的實施情況，並不留情面地予以評說。於是，針砭時政、臧否人物成了他們常有的一種作為，同時，被貶謫、被迫害也成了他們常有的一種境遇。

實際上，中共最初也是由知識分子團體發展起來的，中共第一批黨員幾乎都是知識分子，既有當大學教授的大知識分子，也有當小學教員的小知識分子。他們也都秉承「士志於道」傳統，也都敢於仗義直言、指點江山。

不過，他們也有不同於其他知識分子的地方，比如：

——不自命清高，不故作高雅，很少有文人身上常有的那種酸腐氣，往往能脫下長袍，穿起草鞋，深入社會下層，與勞動群眾打成一片，進而發起工農運動。

——不信奉「君子動口不動手」，不只是用言論批評政敵，還能夠用暴力奪取政權。

——不守承諾，不親同類，奪得政權後就容不得別人批評自己，尤其容不得其他知識分子批評自己，以致完全剝奪後者的發言權。

他們與後者曾屬同一營壘，對後者知根知底，故而不鬥則已，一鬥則鬥到要害處。他們知道後者靠發言論來吃政治飯，便封其嘴巴，叫其無法過政治日子。

知識分子的一個社會角色特徵，就是關心社會、針砭時弊。中國知識分子尤為如此，並且是兩千年一直如此。毛澤東徹底封殺知識分子言論，實是在施行一條自秦皇以來前所未有的知識分子政策。

這一政策不僅使得知識分子幹不了自己很想幹的事，而且迫使他們幹了自己不想幹的事，如強制性改造知識分子思想，讓他們沒完沒了地學習那些假大空的東西，再三再四地書寫那些扭曲靈魂的東西。其中一些被打入另冊的人，處境尤為惡劣，三天一檢查，五天一匯報，舉手打自己耳光，張口罵自己壞蛋。這樣的羞辱恐怕只有歷史上滿族強迫漢人剃髮留辮的羞辱才能與之相比。

執政黨改造知識分子思想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誘迫知識分子背靠背地相互揭發。本來，詆毀思想同仁或出賣政治盟友，最不適合知識分子的性情，也最能折煞知識分子的氣節，至少最違逆知識分子好標榜的東西。可是，那些搞運動的「工作組」、「學習班」、「清查辦」，最提倡這種打政治小報告的做法。長此以往，極大地敗壞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士風，同時也使執政黨在思想文化領域擁有了一支規模空前的告密者隊伍。

毛如此做法，實是對中國士文化傳統的一種反叛。他最初受教於且受惠於這種傳統，最終又竭力貶損這種傳統，給了它未曾有過的傷害和羞辱。

毛如此做法，也是對他自己歷史的一種反叛。打江山時，他最愛講「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致把它看作是中共「三大作風」之一<sup>2</sup>；坐江山時，他最匱乏「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致老虎屁股摸不得。快勝利時，他告誡同志們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sup>3</sup>；可勝利後，他對戰友，

2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095。

3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

對屬下，對朋友，尤其對那些敢於直言的民主人士，既不謙虛謹慎，也不戒驕戒躁，常常是一觸即跳。這裡仍以梁漱溟案為例。

1953年9月9日，周恩來在政協常委擴大會上邀請梁漱溟發言。

9月11日，梁漱溟應邀發言，以比較委婉的方式談了執政黨在農村工作上的一些失誤。發言就事論事。

9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府擴大會議上回應梁漱溟發言，以不點名但聽眾都知說誰的方式談道，「有人竟班門弄斧」，居然在中共面前談論農民問題，「笑話」！談話已就事論人了。

9月13日，梁漱溟與毛澤東短時會面，陳述委曲，說自己本無惡意。毛則咬定梁反對「總路線」，只是不自覺或不承認而已。

9月16日至18日，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上再次發言，繼續陳述委曲，並要求毛作自我批評。

毛澤東於會議期間多次插話，內容近乎破口大罵<sup>4</sup>：

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而你卻把自己描寫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梁漱溟這個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讓別人多知道一點機密，對你就不行。召集比較小型的民主黨派的會議，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參加。

我認為梁漱溟應當做一件工作。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農民」向

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440。

4 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107-115。

人民政府「呼籲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動思想的歷史發展過程。他過去是怎樣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現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場轉到「代表農民」的立場上來了。「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不害羞，事情就難辦了。說梁先生對於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有誰相信呢？班門弄斧。比如說，「毛澤東比梅蘭芳先生還會做戲，比志願軍還會挖坑道或者說比空軍英雄趙寶桐還會駕飛機」，這豈不是不識羞恥到了極點嗎？所以梁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正經的問題，又是一個不正經的問題，很有些滑稽嗎？和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和他是永遠談不清任何一個問題的，他沒有邏輯，只會胡扯。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

一大堆嚇人的帽子，一棍子打死的態度。人們從這裡不難發現，十幾年後的「紅衛兵」是從哪裡學會「大批判」的。

此後，梁先生就不再說什麼了，毛先生卻不想就此罷休。1955年5月，毛澤東發起批判「梁漱溟反動思想」運動，要從屋子裡鬧到屋子外了。這一次，他不打算給對方發言機會了，儘管他曾許諾對方可以為自己辯護；也不打算由自己來說什麼了，只揮了一下手，各路人馬群情激昂，都來批判這個孤立無援的老書生了。

此時此境，不知梁先生有沒有想起他曾說國民黨的一句話：「士有氣節必摧之」；如果想起，又不知梁先生還想不想再說點什麼……

不過，我們知道梁先生三十年後說的話<sup>5</sup>。此時，他已年屆九秩，他的那位怒氣沖沖的老朋友已故去多年。在回顧那樁公案時，梁先生並沒有對曾經惡待他的人報以惡語，反而作了自責，說「有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的批判在後。」言下之意，是由他梁漱溟把事情鬧大的。這是高姿態，是生者替故人擔責任。不過，這也像是羊給虎擔責任，說自己雖是被吃者，但也

5 《梁漱溟問答錄》（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章。

有引誘吃者張開嘴巴的責任。

從實際效果看，梁先生自責有兩重意義：一方面，顯示了他的儒雅襟懷；另一方面，也把毛置於一種尷尬境地，既強烈地反襯出後者的偏狹器量，也使後者的生前恃才傲物的強者形象褪色為死後受人寬恕的弱者面目。

批判梁漱溟時，毛澤東正值六十歲。孔夫子云：「六十而耳順」，說他到了六十歲時，就能夠聽得進任何意見了。毛澤東主席則六十而氣盛，批評不得，頂撞不得，聲音高，脾氣大，把同是六十歲的梁先生罵了個狗血噴頭。毛先生在歷史上怕是坐不上千秋聖賢的位子了，儘管他很喜歡人們叫他「導師」<sup>6</sup>。

剛坐江山時，毛澤東屢屢表示要傾聽各種意見，要學習先人「兼聽則明」。可是到頭來，他有唐太宗雅興，卻無唐太宗雅量，聽不得批評意見，容不得骨鯁之士，致使下屬不敢稟實情，友人不敢說實話。老人家在史上怕是也坐不上開國明君的位子了，儘管他還有些看不起「唐宗宋祖」，譏之「稍遜風騷」（毛澤東〈沁園春·雪〉）。

6 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北京：三聯書店，1971年），頁13-14。

上述可見，民主黨派只是扮演了一種客居他家但住久了就要降為家僕的政治角色，只是運用了一種評頭論足但說重了就要受到懲罰的言論手段。接下來問題是，民主黨派何以要扮演如此角色？何以要運用如此手段？

進一步追索使我們又回到暴力與政權關係問題上。民主黨派之所以有如此境遇，就在於他們所依附著的這一政權是由暴力奪取的。這種奪權方式對奪權後的黨派關係造成兩方面影響：

其一，造成權力分享上的不平衡。憑藉暴力登台的執政黨自是享有絕大部分權力，沒有暴力業績的民主黨派只能落座在權力舞台的邊緣上或角落裡。

其二，造成政治心態上的不平衡。執政黨因自己有著曾過關斬將屢建功勳的經歷，而對民主黨派表現出較大的優越感；民主黨派則因自己有著曾畏槍懼砲常顯文弱的記錄，而對執政黨表現出較多的謙卑感。

關於前一方面影響較容易理解。中國有句老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政權創建也是如此，作出多少努力，也就獲得多少權力。如果政權是用暴力做成的，那麼，投入多少暴力，也就獲取多少權力；或說，流出多少鮮血、損失多少生命，也就握有多大權柄、擁有多大權勢。

中共從其建黨到其奪權，先後投入四次全國性戰爭。其中兩次與國民黨聯手出擊：一是北伐戰爭，二是抗日戰爭。它在前者中僅起偏師作用，只有少量軍隊；在後者中支撐半壁河山，游擊華北華中。另外兩次與國民黨大打出手：一是土地戰爭，二是解放戰爭。前者打成星星之火四起之形勢，後者打到數百萬軍隊決輸贏之規模。

在這些戰爭中，中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遭受了難以想像的損失，流了不知多少血，死了不知多少人。

如「大革命」失敗時，「已經發展到六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一萬多黨員」<sup>1</sup>，餘者僅為1/4。

如「長征」結束時，「紅軍從八萬人減到三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三十萬人減到四萬人左右」<sup>2</sup>，餘者僅為1/8。1934年初冬，中央紅軍突破湘江封鎖線，八萬人馬僅渡三萬，餘者大部屍橫江畔，致使湘水變色，如落晚霞。

中共在上述兩個歷史時期的損失，除了可從總量上統計外，還可從結構上看，即可看到這些損失給中共日後發展帶來結構性失衡。

例如，在大革命失敗時，中共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大部被捕殺。

中共最初是一個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政治組織。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有著較高素質：

其一，他們中的多數人都誦讀過孔子孟子，受到過傳統文化的熏陶，有著較厚重的人格底蘊；

其二，他們中的一些人還留學過東洋西洋，感受過現代文明的氣息，有著較開闊的眼界；

其三，他們都親身經歷過「五四運動」前後思想解放時期——即中國百年來新聞檢查最少故而思想言論最為活躍時期，有著較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較敏銳的思想辨別力。

然而，1927年的屠刀就首先要砍他們的腦袋，並也確實砍了他們中許許多多人的腦袋。

這種人員損失給中共組織帶來結構性惡果，使它在其後來的發展過程中一直缺乏那種老資格的、高質量的知識分子黨員，尤其缺乏那種與毛澤東旗鼓相當、既能有效幫助他又能有效制約他的知識分子。

1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739、740。

2 同前註。

又如，在兩萬五千里長征中，紅軍最優秀的基層幹部幾乎被打光。

在戰爭中，下級軍官比高級軍官更缺少保護、比普通士兵更負有責任，常被要求帶領屬下士兵衝鋒在前、撤退在後，其傷亡率較高。尤其當戰爭十分慘烈、下級軍官又十分勇敢時，其傷亡率就更高了。紅軍長征時總是處在敵軍優勢兵力的圍追堵截中，其頭常被打爛，其尾常被截斷，因而軍中那些勇於舉著駁殼槍領著戰士向前衝、向後打的連排長們就很難存活下來。

這種人員損失也給中共軍隊帶來結構性惡果，使它在其後來的將官階梯中出現一個相對薄弱的層次，即在1955年被授銜為少將者中名將很少。

這個黨裡能夠從1920年代活到1949年的元勳，大都是倖存者，大都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倖存者。彭德懷開「平江起義」時的十幾位親密戰友，也是紅三軍團初創時的中堅分子，在不到七年時間裡全部犧牲。彭的參謀長鄧萍就是其間最後犧牲的一位，殉於1935年2月遵義城下。彭的兩個胞弟全遭殺害，留下一群孤兒。毛澤東兄弟三人，兩死一生；其元配夫人所生三子，一死一瘋一丟失。

這個黨屢屢說，她的黨旗、她的軍旗、她的國旗，都是用鮮血染紅的。這個比喻是恰如其分的。這個黨的領袖作詩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毛澤東《七律·到韶山》）這個感嘆是發自真情的。

就在共產黨浴血奮戰時，民主黨派有何作為？贊成不贊成使用暴力？流沒流血？

不能說民主黨派全然反對使用暴力，但可以說他們不熱心於使用暴力，至少不熱心於由他們自己來使用暴力。這其間有一變化過程。

當國共兩黨在談判桌上爭執而沒有結果時，當國共兩軍在戰場上相持而未分勝負時，民主黨派屢屢發表和平宣言，反對戰爭，反對暴力，既反對國民黨動武，也反對共產黨用兵：

「民盟是個沒有武力的政黨，民盟絕對相信無論當權或在野的政黨擁有武力，國家不會有和平，更永遠不能走上民主的正軌……民盟始終是超然獨

立的第三者，努力調解國共兩黨間的武力衝突。」<sup>3</sup>

「本同盟始終堅持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身從未利用武力，並堅持各政黨均應放棄其武力。」<sup>4</sup>

此時中國很是熱鬧，既有玩命打架的，也有好心勸架的。不過，架是要打下去的，勸是不起作用的。勸者縱有善意，但會勞而無功。這猶如一隻羊向兩條爭搶肉食的老虎念叨素食的好處一樣，自是白費口舌，並會危及自身。就近現代中國來看，和平固然好，但不現實。現實是不拿刀槍的政治力量總要受到武裝起來的政治勢力的壓迫與羞辱，一部民主黨派史可以說是文人政治不斷遭受武人政治欺侮的歷史。

當國民黨最終撕破臉皮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後<sup>5</sup>，當共產黨最終強大起來以致把老對手揍得快趴下時，許多民主黨派開始改變他們原先想當和事佬的「第三者」立場，明確支持中共進行武裝奪權鬥爭。

他們宣稱：中共的奮鬥史「值得每個愛國的中國人讚佩，本盟今後要與他們攜手合作」；並高呼：「徹底消滅獨裁賣國的國民黨反動集團！」<sup>6</sup>

他們說要「徹底消滅」，即是贊成大動干戈。不過，他們這個口號是在國共雙方砲火都打不到的英租界香港喊出來的。他們還只是站在拳擊場外喝彩別人的拳頭，還沒有也不準備親身下場亮出自己的拳頭。

也不能說民主黨派從未流過血，但可以說他們只流了很少的血。

3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在南京招待新聞記者發表保持第三者地位的聲明(1946.11.25)〉，《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頁248-249。

4 〈中國民主同盟政協代表為李聞案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1946.7.22)〉，《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頁206。

5 〈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團體(1947.10.27)〉，《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頁360。

6 〈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三中全會宣言(1948.1.19)〉，《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頁374-378。

民盟常常訴說他們為中國民主事業付出很大代價：報紙被查封，組織被破壞，人員被迫害；常常提到他們有「四烈士」：李公僕、聞一多、陶行知、杜斌丞。其中陶雖不是被暗殺死的，但也是上了黑名單的，並是為局勢憂愁而病逝的。

他們說的這些話都是實話，他們說的這些烈士都是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然而，就付出代價而言，他們無法與中共相比。後者僅在二次國共戰爭中就傷亡了152萬人<sup>7</sup>。對此他們自己也予以承認：「中國人民得到解放，拿槍桿的戰士們，盡力最多。」<sup>8</sup>

毛澤東的黨正因其出力最大流血最多而能夠在新政權中占據最重要的位置。民主黨派則因其暴力業績平平而只能在新政權中據於很次要的位置，即只能被前者任意領導而不能對前者予以有效制約的位置。在這裡，權力的分享依據投入與回報相對應的原則，投入多少暴力就獲得多大權力，猶如創辦公司，投入多少啓動金就獲得多大控股權。

民主黨派只因做了一些輔助性工作就被接納到新政權中，似應明白，自己只打了半票就上了別人車子，既得著便宜就不好再對這車子說三道四了。

7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簡編》（解放軍出版社，1983年），頁607。

8 《中國民主同盟代表沈鈞儒在全國文代會上的講詞(1949.7.2)》，《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頁558。

## 10

暴力奪權的方式，不僅能使暴力施行者在權力分享上優先那些曾退避刀劍的盟友，而且能使他們在政治心態上震懾這些盟友。這後一方面影響常常不為人們重視。

暴力絞殺雖然殘酷，但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潛力，激發人的勇猛精神和聰明才智。因為，不勇猛則敗、則亡，不聰明則落入圈套、則陷入十面埋伏。中國歷史上最具有丈夫氣魄的君主大都起於疆場，如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中國歷史上最為實用的謀略大都出於戰例，如從「瞞天過海」到「走為上」的三十六計。

暴力絞殺當屬最嚴峻的生存競爭。能從中獲勝者，自然是強者，儘管未必是善者。暴力絞殺能乾淨利索地淘汰弱者以選擇強者，持續且劇烈的暴力絞殺則能更進一步地淘汰一般強者以選擇最強者。無庸置疑，歷經長期戰爭而獲取勝利的毛澤東及其戰友當屬這強中之強者。

對於這類強者，人們常存有一層怯意，特別是那些與這類強者雖屬同一營壘卻未下場搏擊的盟友，除有怯意外，還有愧意，還有謙卑感。在這類強者與這些盟友之間存有一種不平衡的心態關係，即俯臨輕慢與仰視臣服的心態關係。

公元前207年，秦圍趙於鉅鹿，楚欲相救。楚卿子冠軍宋義奉命率軍西援，行至安陽，屯兵避戰，裹足不前達四十六日。楚將項羽怒而斬殺宋義，被擁立為上將軍，旋即引兵西渡，「皆沉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接而九戰九勝，大破秦軍。

楚兵雖是孤軍作戰，但非孤軍臨敵。就在戰場四周，還有其他十幾路諸侯援軍。他們先楚軍而到，屯於壁寨。當楚秦大戰時，他們無一敢出壁助戰，只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

恐。」戰畢，眾諸侯受項羽召見，「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為屬焉。」（司馬遷《史記》卷17）

項羽正是通過這種驚心動魄的暴力絞殺，既擊敗敵兵，又威震盟友；既使前者潰亡，又使後者臣服。掩卷而思，中共紅色暴力似也如此，既使八百萬國民黨軍隊灰飛煙滅，也使眾多民主黨派人士心悅誠服。

毛澤東1949年進京，也是一身征塵，八面威風。那些趕來晉見的民主人士，雖不是「入轅門」而「膝行」，但多有誠惶誠恐狀。在這位有著魁偉身形的古都新君面前，諸公最常做的動作是「豎起大拇指」，最愛用的字眼是「真偉大」。

不過，在一些人那裡，這種心悅誠服很快就變成心有餘悸了，欽佩之餘，惶恐又生。民主人士多為讀書之人，雖文弱卻有心數，雖安分卻很敏感。他們很快就能通過那張掛得滿中國都可見的領袖畫像，感受到畫上人的那種君臨天下、無所不在的威嚴；很快就能透過那張安寧祥和且少有濃鬚的銀盆大臉，感受到慈面人的那種說一不二、難容異己的霸氣。

他們既敬重又畏懼這位比老蔣更強大更有手段的執政者，故採取了一種比以往更小心更少有作為的政治態度。

在老蔣專政時期，他們多少還能保持一些政治獨立性，還能發出一些自己想說而執政黨不想聽的聲音，如在由國民黨主持的會議上直接批評政府，如在民辦的報紙上公開譏諷權貴。中國民主同盟曾經隔三差五，不是發文告，就是答記者問，發難國民黨，奚落委員長，忙得不亦樂乎。

到了毛公當家時，他們就逐漸失去政治獨立性。尤其到了1957年後，他們已不可能發表獨立意見、不可能公開批評執政黨及其毛澤東主席，儘管此黨此主席可批可評東西越來越多、幾成大錯誤常有小錯誤不斷之勢。

他們中雖有一些仍敢直言者，但多遭不測，輕者挨批，重者被抓，並累及三代。其親屬們每每在填寫政審表格中的「家庭關係」或「重要社會關係」的欄目時，都久久不能下筆，可又不能不下筆，不能不寫上那個會給他們帶來惡運的至愛親人的名字，並注明他所戴政治帽子的稱謂，是「右派分子」

還是其他什麼「分子」。

當然，他們中也不乏有精明乖巧者。這些人識時務，曉利害，很快就調整了自己的處世方式，言不敢大氣，行不敢獨為，觀風向說話，聽號召做事。他們以往多是生性高傲不願嫁人的政治老處女，如今變得也要委身他人了。

不過，這些出閣者已是舊日黃花，嫁到他人家自是難獲寵愛，多數時間被棄之一旁，只是在逢年過節或遇重大禮儀性活動時，才被從佈滿塵封的後院裡呼喚出來，打扮一番，呈花枝招展狀，擺設在共和國禮堂中，供人觀瞻，以顯示此當家者不是孤家寡人，還有三房四室，並相敬相愛，共享家政。

這些民主人士如此恭敬執政者，執政者又如何看待這些民主人士呢？令恭敬者沮喪的是，受恭敬者僅從高堂之上投下輕蔑的一瞥。

雖然毛公與某些民主人士有些私交，但他對作為整體的民主黨派以及作為整體的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主要成分)，是不抱好感且不予高看的。他認為，民主黨派是軟弱的動搖的，在民主革命時期既支持革命又害怕革命，在社會主義時期「既是反對派又不是反對派」，因而需要執政黨來對其「既團結又鬥爭」。他認為，知識分子不過是「皮上的毛」，沒有獨立性，只有依附性，其中大多數人都有著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世界觀，因而需要執政黨來對其進行「思想改造」。

可毛自己的世界觀也需要好好改造，用他自己的黨在他死後做決議的話來說，其間有著許多「封建專制主義」的「遺毒」<sup>1</sup>。這種封建性東西比起他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思想或小資產階級思想來，要落後得多、卑劣得多。儘管如此，他仍要去改造人家、整肅人家，少則整個幾十萬，多則整上幾百萬，即便整過了、整錯了，也毫無悔疚之意。老人家拿民主黨派拿知識分子很不吃勁，有時完全不當一回事。

人們不禁要問，毛澤東為何如此對待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

<sup>1</sup>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767。

有一種較流行的解釋：毛青年時曾在北京大學謀到一個圖書館小職員差事，每天跑前跑後地為那些名牌教授、正牌學生，登名記號、拿書取報，有時還不免受到一些冷落和歧視，於是在內心深處埋下了嫉恨種子。因此可以說，他晚年實行的知識分子政策，是對於他早年北大經歷的一種回應，是撫平他早年心靈創傷的一種舉動。連境外學者也持此看法：「看來，毛沒有忘記1919年他在北京大學受到的冷遇。這使他有一種糾纏不清的心理慾望，一有機會就把知識分子置於他們應在的位置。」這位西方學者還多少有些戲謔地稱毛是一位「半知識分子」<sup>2</sup>。

這就把毛晚年做出的那些不善待知識分子舉動，看作緣於他早年萌生的某種陰暗心理，即嫉恨那些有著顯赫科班背景的知識分子的心理，從而把他描繪成一個心胸狹窄、得志便猖狂的小人。這顯然是文人的說法，是文人愛聽愛傳的說法。筆者留意到，一些頗有學歷者議論毛議到高興處，常會復述這一說法。這樣說或許能使文人較容易地實現自己對毛的精神勝利，尤其能使那些在毛生前備受羞辱的文人較容易地在毛死後慰藉自己、娛悅自己。不過，這種說法終究有些勉強。我們固然不能排除毛曾有嫉妒知識分子的內心情結，但可以說這不是他屢屢整肅知識分子的主要原因。一個簡單事實，就是他身上可以驕傲的東西比起一般知識分子來要多得多，故沒有許多必要去勞心傷神地琢磨後者、設陷後者，以恢復自己的內心平衡。

古人韓信，早年落魄鄉中，受過胯下之辱；後來輔佐劉邦，因功受封楚王。他在榮歸故里時，並未報復曾迫他鑽襠者，反而稱之「壯士」，賞官「中尉」。(司馬遷《史記》卷92)赫赫楚王已犯不著與小民鬥氣，率千軍者豈容不下一區區中尉。

古人如此，今人似也如此。1918年時的毛澤東不過爾爾，僅為一個學歷不高、閱歷不深的小知識分子。數十年後的毛澤東就不同凡響了，已是一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詞壇高手、文苑俊才。昔為寒士，今為豪士。此時他

2 R·特里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中譯本），頁199-200。

還會嫉妒誰？還會用上許多心思去倒騰那些小肚雞腸事？

1945年，黃炎培先生訪問延安。毛主動打招呼：黃先生，我們早已見過面了。黃迷惑不解。毛爽言道：「廿多年前的一天，先生發表演講，高台宏論，就在下面眾多聽者中有一個叫毛澤東的人。黃先生不認得他，他倒把黃先生記住了。」

1938年，梁漱溟先生訪問延安。毛也主動打招呼：「梁先生，我們是見過面的，不知你還記得不記得？那是民國7年(1918年)的事了。先生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我總是給您開大門。」<sup>3</sup>

毛澤東不善待知識分子，很難說是出於某種嫉恨的情結，相反，倒有可能出於一種輕蔑的心態。一種小處還客氣、大處便瞧不起的心態。他對於知識分子，與其說嫉賢妒能，勿寧說恃才傲物。他晚年曾對身邊人說了這樣一段話：「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接著他又解釋道：「因為這些秀才有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誰，文人相輕嘛。」<sup>4</sup>

老人家說話時行將就木，快走到人生盡頭，故說出來的話當屬其平生經驗。另外，老人家說話對象是其女服務員，一是在地位上與心智上低他許多而不對他造成任何心理壓力，二是與他朝夕相處而親近隨和，故使他談起話來少有顧忌且多顯真情。

毛說話不多，三言兩語，但已把自己的「秀才」觀說出個大概來，其見解其語氣都頗合他的那種不同尋常的經歷和個性。

「五四運動」以來，中國政壇上的知識分子，能言善辯者不少，舞文弄墨者不少；但實有成就者很少，改天換地者更少。1919年，一大批慷慨陳詞

<sup>3</sup> 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江蘇文藝出版社，1989年），頁7。

<sup>4</sup> 郭金榮《毛澤東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學出版社，1993年），頁85-86。

者走上北平市街頭；1949年，很少有原「五四運動」參與者因建功立業而登上天安門城樓。究其原因，還正應了老人家說的那幾句話。他們中的許多人，說是要喚起民眾，卻不願深入工農；說是要反對暴政，卻不願拿起槍桿；結社議政，略有起色，紛爭即起；組團參政，稍有進展，內訌又生。

不止是黨外有這種情況，就是黨內也有這種情況。要說讀中國書，談文化理論，陳獨秀先生要比當年毛澤東強得多；要說讀外國書，背馬列本本，王明也要比當年毛澤東強得多。可是，兩者都是言論有餘，實幹不足。結果，一個對中共蒙受「一戰」失敗(四分實力去其三)負主要責任，另一個對中共遭受「二戰」失敗(八分實力去其七)負重要責任。

「五四運動」七十年後的「八九民運」，似也有著內訌過多的問題，似也應了那位已去世多年的政治老人所說的那番話。當然，毛不會看不起一切「秀才」。他自己就是「秀才」，他的許多同事也是「秀才」。不過，他們這些「秀才」不同於傳統的「秀才」，不同於那些造反三年、三十年乃至三百年也不成的「秀才」。

他們說得多，做得也多，既動嘴，也動手，脫去長衫穿草鞋，扔掉斯文進綠林，用毛的話說，爲了挽救革命，不惜「擔任土匪工作。」儘管毛澤東未必真心喜歡農家生活，曾千方百計要離開韶山衝到大地方去；但他爲了革命需要，又心甘情願地重返農村，並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儘管毛澤東未必真心喜歡玩槍弄砲，曾當了五個月大兵就退出軍隊；但他爲了生存需要，竟興趣昂然地搞起武裝鬥爭，並頗有心得地寫出多篇軍事大作。儘管毛澤東的黨也有許多私鬥與內訌，但他和他的同事們總是盡可能地強調組織紀律性，盡可能地設法將私鬥控制在公鬥之下，將內訌控制在不致於造成組織破裂的限度之內，並基本做到了這一點。

幾十年下來，那些儒雅秀才與這些綠林秀才各有什麼結局呢？

1940年代末，國統區裡搞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打出一幅非常醒目且琅琅上口的標語：「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標語雖只提到教授，但能反映出大部分民主黨派及其知識分子的現實境況與真實心態；其內容是合乎事實

的，他們越要爭民主越爭不到民主，越想吃飽飯越吃不到飽飯；其語氣是不勝悲哀的，他們發出的只是弱者的一種喊疼叫痛的號啕聲，只是被捉弄者的一種牢騷滿腹的抱怨聲。

就在這同時，山那邊的秀才們正高唱著他們的軍歌：「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正統領著自己的隊伍，銳不可擋地從高山峻嶺之上衝下來，從窮鄉僻壤之中殺出來，越衝越猛，越殺越強，漸成鋪天蓋地、倒海翻江之勢。此刻的毛澤東，正晃晃悠悠地騎在馬上，不無得意地告訴世人，陝北的小米好養人囉。

很難想像，這位馬背君主會嫉妒那些於「越教越瘦」中等待他去「解放」的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同時不難想像，這位政治老人在談到「秀才造反三百年不成」時的那副似笑非笑的神態。

既然毛澤東政權從其外部不能得到有效制約，既不能得到政敵方面的有效制約，也不能得到盟友方面的有效制約。那麼，這個政權從其內部能不能得到某種補償、能不能做到「堤外損失堤內補」？即能不能通過它自己來制約它自己？

這一問題可分為兩個層次：

其一，這一政權有沒有自我制約力？

如果有的話，

其二，這一自我制約力能起到何種作用？

縱觀新中國史，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政權的確有過某種自我制約力。這種自我制約力主要表現在三個層面上：

一、對執政黨中的普通黨員的制約；

二、對執政黨中的領導幹部的制約；

三、對執政黨中的最高領袖的制約。

關於第一層面的制約效果，較為明顯。多數黨員群眾安分守己，是「黨的馴服工具」，是「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前一說法出自國家主席劉少奇，反映的是黨對下層成員的要求，後一說法出自普通戰士雷鋒，反映的是下層黨員對黨的態度。

關於第二層面的制約效果，也不難看到。許多黨員幹部官運曲折，既有過發號施令的歷史，也有過被「整風」作檢討的記錄；既有過前呼後擁的風

光，也有過「戴高帽遊大街」的恥辱。

關於第三層面的制約效果，則較為複雜。

首先，就毛澤東的個人態度看，是兩重的：一方面，他號召全黨同志都要自覺接受黨的制約；另一方面，他自己卻不願接受這種制約，聽不進話，容不得人。1953年，他批評劉少奇、楊尚昆不經過他允許亂發文件<sup>1</sup>；1965年，他自己卻背著黨中央亂發姚文元文章，以致搞亂了黨和國家。

其次，就毛澤東的實際境況看，也是兩重的：

一方面，他確實受到了這種制約。他在執政27年裡遭遇過各種阻力。其中，最強勁的阻力，不是來自執政黨外的民主人士，而是出自執政黨內的異己力量。對付前者，老人家只要玩玩「陽謀」即可打發了事；對付後者，老人家就要處心積慮、傾其全力了。搞一場「反右運動」以整肅黨外民主人士，用不了一個夏季便鑄成鐵案；搞一場「文化大革命」以打擊黨內異己力量，雖歷經十個春秋還未決勝負。

另一方面，他又不斷反擊乃至摧毀各種制約他的力量。政府總理反對他「冒進，他就斥其為「右傾」，並責令其在黨代表大會上作「公開檢討，損其威信。國家主席不按他辦法行事，他就斥其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並為之發起全國性批判運動，最終將其迫害至死。國防部長批評他好大喜功、小資產階級狂熱，他就將其先削去兵權、逐出中央，後打入牢中、關押至死；總參謀長不贊成搞「政治可以衝擊一切」，不贊成用學《毛選》來代替軍事訓練，他就允准林彪等圍攻此人，逼得此人跳樓摔折了腿……因此可以說，毛執政的歷史就是他不斷摧毀各種試圖制約他的政治力量的歷史。他既整文臣，又整武將，以致朝中無人敢犯顏直諫，以致自己無事不為所欲為。

就一個人來說，如果他在其成長過程中，既不讓別人來管束自己，也不

<sup>1</sup> 毛澤東，〈對劉少奇、楊尚昆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的批評〉，《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80。

打算自己來約束自己；那麼，他就是一個「渾小子」，爲人做事，不守章法，不知節制；並將成爲一個「壞小子」或「傻小子」，什麼樣的壞事或什麼樣的傻事都能做得出來；到頭來免不了會落得個「倒霉小子」，自吞自咽這些壞事傻事。

就一個黨或一個政權來說，如果它既拒絕外部制約力，又失去內部自制力；那麼，它就是一個「渾黨」或一個「渾政權」，盲人瞎馬，胡闖亂撞，什麼樣的荒唐事都能做出來；最終要弄得天怒人怨，既害百姓，又損自身，國將不國，黨將不黨。

對於這一點，毛澤東與其同事在剛建立政權時看得比較清楚。因爲，他們剛看到一個缺乏自我約束力的政權（南京政府）是怎樣崩潰的；並且，他們還知曉許多得了江山便忘乎所以的政權（如李自成大順朝）是怎樣敗亡的。

建國前夕，在中共七屆二中會議上，毛澤東不無憂慮地預測道：「因爲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sup>2</sup>「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砲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sup>2</sup>

針對這些將會出現的情況，毛澤東又未雨綢繆地向其黨人提出要求：「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sup>3</sup>

會開完了，毛要上路了，要上北京去號令天下了。此時恰逢「春分」節氣。他這趟路可謂「春風得意馬蹄疾」。

老人家畢竟起於逆境，在長期苦鬥中養成了遇事多慮的習慣，既會朝最好的方面去謀畫，也會從最壞的方面去設想。他在即將奪取全國政權時，既

2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直排合訂本），頁1439-1440。

3 同前註。

躊躇滿志，又忐忑不安，總是在神采飛揚之餘牽掛著一個人。這個人有著與他相似的開端，也是出於鄉村、起於暴力；但也有著令他發慌的結局，數十年的艱苦奮鬥抵不上數十日的驕奢淫逸，到手的江山得而復失。此人就是李自成，就是毛澤東進京時最愛提起的人。

走之前，他指著正準備行裝的貼身衛士的腦袋說：「小心，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砲彈，不要當李自成。」走之時，他又告誡正準備上車的周恩來等同行大員：我們此次「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sup>4</sup>

這個黨的其他領導人也對此有共識。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陳雲向在座的「穿黑衣服」或「穿黃衣服」的「黨頭、政頭、軍頭」發出告誡：

「原來想，革命已經勝利，似乎可以不出張國燾之類人物了。現在看來，恰恰相反，革命勝利了的國家，更容易出。現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溝裡打游擊的時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為革命來的，還是為做官來的呢？回答這個問題也容易。起初是幹革命來的，以後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後來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來越大，(笑聲)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勝利了的國家裡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後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sup>5</sup>

關於執政黨需要進行自我制約問題，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在建國初不僅發了許多議論，而且做了許多實事。

新政權誕生剛過一個月，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設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其職責是：檢查上自中央下至基層各級黨組織及其黨員違犯黨紀的行為，並給予處分；教育廣大黨員嚴格遵守黨紀，認真執行黨的決議和

4 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頁123-124。

5 陳雲，〈高級領導人要提高革命覺悟〉，《陳雲文稿選編(1949-1956年)》(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217。

政府的法令。

新政權誕生剛過半年，1950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鼓勵人民群眾公開地揭露和糾正執政黨的缺點和錯誤，幫助執政黨及其政府克服官僚主義，促進國家民主化。

這是想把大眾傳媒作為人民監督執政黨的一種手段。這種監督手段按現時說法，屬於「三權」之外的「第四權」——「新聞權」，即人民可以通過新聞輿論來監督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因此，中共在建國初做出的這個決定，是很有民主氣息的。它堅持的是「言論自由」的主張，是「政治公開化」的主張。人們今天讀起來不免感到驚異和惋惜。驚異的是，這個如今大講「宣傳輿論導向」的執政黨，竟也說過如此開通的話；惋惜的是，這個屢屢需要「撥亂反正」的執政黨，如果能自始至終地實行這個決定，就不會犯那麼多的錯誤，那麼多或「右」或「左」的錯誤，那麼多別人看得清而自己看不清的錯誤。

1950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整風」三季，即於當年夏、秋、冬三季開展一次「整風運動」。其內容是，整執政黨內功臣自居、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等歪風，改善執政黨同人民群眾關係；其重點是，整各級領導機關幹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其方法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整風」剛停，「整黨」又起。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整黨」三年，即在未來三年中「有計畫、有準備、有領導」地進行一次整黨運動，對廣大黨員進行在執政情況下如何做合格共產黨員教育，同時將一部分蛻化變質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清除出黨。運動於1954年基本結束。被開除出黨者和被勸退出黨者達65萬人，占整黨前中共黨員總數1/8。執政黨自己給自己做了一次大切除手術。

「整黨」未完，「三反」又興。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12月8日，中共中央再發指示，給運動定性加碼，要求

全黨把「三反」看得如同「鎮壓反革命」一樣重要，並宣告中央懲治「三反分子」決心，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法辦乃至槍斃。運動在1952年1月達到高潮，經過「揭發」、「處理」、「建設」三階段，於1952年內基本結束。運動共打出「老虎」（貪污1千元以上者）10萬餘隻，其中，逮捕9百餘人，處決40餘人。在被處決人中，有2位執政黨高幹，一是原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一是原天津地區專員張子善。兩人都追隨中共二十年，出生入死，堪稱革命功臣，也都因貪污巨額公款而不容於剛進城的執政黨。

因此，說這個執政黨從未認識到自我制約的重要性，那是冤枉了人家。因為，他們曾反覆念叨過李自成的教訓，念叨過糖衣砲彈的害處。同樣，說這個執政黨從未做出過自我制約的實事來，那也是冤枉了人家。因為，他們也曾該抓的抓了，該判的判了，甚至該殺的也殺了，手起刀落，血濺自家衙門，一點都不含糊。

可是執政黨缺乏自我制約問題仍然存在著，甚至嚴重存在著；否則，它就不會做出那許多「渾事」來。那麼，問題的癥結出在哪裡？出在執政黨中的哪一個層次上？問題的癥結不出在對廣大基層黨員的制約上。因為，他們大都能循規蹈矩，大都能服從管束，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

並且，問題的癥結也不出在對許多領導幹部的制約上。因為，在傳統金字塔式的權力架構中，所有居於中間層次的人，雖能管束比他們層次低的人，但自身也受到比他們層次高的人的管束。他們既對下屬指手畫腳，又對上峰打拱作揖。如脾氣很大的王震將軍，向下面做報告，時有「鬍子」模樣，又拍桌子又罵娘，甚至摔壞麥克風；可到了彭德懷元帥面前，到了毛澤東主席面前，就不再「鬍子」了，而是循規蹈矩、約束有加。

問題的癥結，既不出在低者，也不出在中者，只能出在高者，出在權力架構的頂層，出在那個能夠俯臨九州的金字塔塔尖上。

## 12

毛澤東制約他手下所有人，那麼，他自身是否也受到制約？

前者陳述的是一個確定事實，後者追問的是這個確定事實的不確定前提。這一追問有些類似羅素的「剃頭匠難題」：

在一鄉村中，有一剃頭匠宣告：

我給不給自己剃頭，要看我是否給別人剃頭。

他(A)給此地所有不給自己剃頭的人(a)剃頭(即A被a所包含)。

他給不給自己剃頭，要看他是否給自己剃頭。

人們聽後不免發問：你給不給自己剃頭？於是，這位剃頭匠陷入了一種難以說清的邏輯矛盾，說給也不是，說不給也不是<sup>1</sup>。同理，如果毛以為他可以剃所有人的頭、刮所有人的鬍子，那麼，人們也可以反問他，您老人家自己的頭要不要剃、自己的鬍子要不要刮？如果也要剃、也要刮，那麼，由誰來剃、由誰來刮？

在羅素那裡，有所謂能剃所有人頭的人他自己的頭剃不剃的問題。在我們這裡，有所謂能制約所有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約的問題。前者屬數論邏輯問題(集合論佯謬)，後者屬現實政治問題。這一現實政治問題既涉及該黨理論宣傳工作，也涉及該黨施政運作情況。

中共「七大」，把毛澤東「正式」選為中央主席，同時把毛澤東思想寫入《黨章》。此後，毛就被看作是黨的旗幟、黨的化身，進而又被看作是老百姓的大救星、新中國的紅太陽。毛的耳旁響起一片「萬歲」聲。

1 如果他不給自己剃頭(即是a)，那麼，根據他的先前宣告，他就應該給自己剃頭(因為a應該被A包含)；反之，如果他給自己剃頭(即為非a)，那麼，根據他的先前宣告，他就不應該給自己剃頭(因為非a不被A包含)。

在這一造神運動中，中共一些高級領導人竭盡全力來推波助瀾，並因此而獲得毛的欣賞和重用。自老人家領銜中央最高決策圈後，圈內凡能從排名較低處一躍而至排名第二位者，都是在宣傳他個人方面有突出貢獻者。前有劉少奇，後有林彪。

前者最早把毛澤東思想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看作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sup>2</sup>。後者則要「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全國人民的頭腦，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sup>3</sup>

前者宣稱：「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sup>4</sup> 後者則宣稱：「毛主席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高得多。現在世界上沒有哪一個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sup>5</sup>

前者把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使之成為中共教義。後者則在大力宣傳毛澤東同時，也使自己順勢擠進了《黨章》，成為法定「接班人」。

前者宣傳毛澤東個人還不太離譜，還同時強調：「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的領袖，但他又是我們黨的一個普通黨員。他是在黨的支配下，並以最謹慎的態度來遵守黨的一切紀律的。」<sup>6</sup> 後者則把毛宣傳得過於神話：「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歲、一百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sup>7</sup>

2 劉少奇，〈論黨〉，《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32。

3 林彪，《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

4 劉少奇，〈論黨〉，頁336。

5 林彪，〈關於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個新階段的指示〉，《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國防大學編)，第25冊，頁123。

6 劉少奇，〈論黨〉，頁319。

7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

即便老成持重的周恩來總理在談到毛澤東時，也是誠惶誠恐、維護有加。不過，與上述兩者不同，周公常常不是通過正面渲染來直接頌揚毛澤東，而是通過檢討自己來間接烘托毛澤東。這樣既顯得誠懇，又顯得不過於奉承。據其身邊工作人員回憶，他屢屢向同事們談起他曾在歷史上犯過反毛主席的錯誤，並表露出深深的自責感，結果常常弄得大家心情都不好受。這樣談的次數很多，「不下百次」，致使聽者們都聽膩了，躲避不及，於是請衛士轉告他，爲了使大家在一起輕鬆些，最好不要再反覆提那些舊事了<sup>8</sup>。

可見，在這些大員們如此爲毛大造聲勢情況下，再來談要制約他、要剃他的頭、要刮他的鬍子，就有些不識時務了。你不慫足了「一萬句話」，怎麼敢頂撞他一句話？你不準備作「一百次」檢討，又怎麼敢反對他一次？

這就在理論宣傳上，把毛澤東擺在他可以制約全黨而其自身不受制約的位置上，即擺在執政黨自我制約之外的位置上，從而使執政黨自我制約架構出現了一個漏洞，一個非同尋常的漏洞——漏掉了最不該漏掉的東西。這個架構攔住了許多條較小的魚，卻放走了一條最大的魚。

因爲，毛澤東不是執政黨的普通人員，更不是共和國的普通公民，而是這個黨、這個國家的特殊人物。他本人是一人專黨，他的黨又是一黨專國，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影響著這個黨、這個國家。黨的安危繫於他一身，國家的興衰繫於他一身。因此，在這個黨、這個國家中，他最應該謹言慎行，最應該受到制約。

可是，這個最應受制約的人卻被認定爲最不受制約的人，這就使執政黨陷入一種豪賭境地：黨將所有賭資都交於他，他卻可以無所顧忌地想怎麼下注就怎麼下注、想怎麼出牌就怎麼出牌。一人贏，全黨皆贏；一人輸，全黨皆輸。贏了，鮮花和頌詞都必須獻給他；輸了，批評與處罰卻不能加於他。到末了，他一轉身就可走人，而他的同志們還走不了，還要硬著頭皮面對他

25冊，頁23。

8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頁329-330。

留下的爛牌殘局，還要想方設法償付他欠下的巨大賭債。

當我們再把目光從這個黨的言論宣傳層面投向它的施政運作層面時，當我們再在經驗事實背景下審視上述「能制約一切人的人他自身受不受制約」這一問題時，就會發現相互矛盾情況：

如果說毛澤東執政不受制約，那麼，他為何每做一個重大抉擇都要搞一次路線鬥爭？為何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整一次人？

如果說毛澤東執政受到制約，那麼，他為何能夠製造出那種餓死千萬人的大饑荒？為何能夠炮製出那種株連億萬人的大冤獄？

毛澤東的確受到過許多制約，故要常常搞起整人運動。毛澤東也的確摧毀了這些制約，故能接連製造巨大災難。這種制約與反制約衝突，不斷出現於老人家政時期，並將這一時期畫分執出不同階段來。

## 13

1976年春，毛澤東已是壽期無多了。正像人們在將要離開某個使其流連忘返的景地時常常要回首身後那條蜿蜒小路一樣，老人家也在將要離開這個讓其牽腸掛肚的世界時禁不住回首自己一生風雨歷程，慨然而言：「我一生辦了兩件事，一是搞民主革命，奪取全國政權，對此持異議者甚少；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對此擁護者不多，反對者不少。」<sup>1</sup>

毛所說的這兩件事，一是屬打江山事，二是屬坐江山事。在此，我們對前者不多加評論，對後者倒有些補充。

老人家坐江山27年，辦了許多件事，其中有兩件事最重要：一是搞經濟建設，最終搞出了「大躍進」；二是搞政治運動，最終搞出了「文化大革命」。就實際情況看，前者的重要性並不亞於後者的重要性，以至可以說沒有「大躍進」就沒有「文化大革命」。不知毛為何只提後者不提前者。

平心而論，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後也想搞好經濟建設，改變國家貧窮面貌，讓老百姓過好日子。他的這一願望在他建國初的許多講話中頻頻表露，意切言真。

毛有如此願望，是合乎常理的。歷史上大多數統治者就其本心來說，都希望治下臣民能夠安居樂業。因為，老百姓的日子好過，他們的日子也好過；反之，老百姓的日子十分困苦，他們的日子也不會十分舒服，一是因為老百姓能夠提供給國家的東西少了，二是因為喊冤叫屈的人乃至聚眾鬧事的人多了。毛自然明白這個道理，何況他本人就來自社會基層，能體察老百姓的疾苦和需求。

最初，毛澤東不僅有此良好願望，而且做出顯著成績，使「新中國」的

---

1 胡繩，〈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人民日報》，1993年12月17日第5版。

「新」字落到了實處：迅速完成戰後經濟恢復工作，使工廠開工，使商店開門，使曾像野馬一樣狂奔的物價上漲指數得到控制；迅速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打破封建土地關係，使農民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迅速建立一批大中型企業，形成國民經濟骨幹產業，使工業品產量成倍上升……可以說，1950年代上半期是歷經滄桑的中國人民最感希望的時期。

隨著毛的權威越來越膨脹，毛的身上也開始發生變化了：

他的腦袋開始發熱了，有些想入非非了，先說要十五年趕上英國、五十年到七十年趕上美國、五十年後會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後說要「兩年超過英國」、「十年趕上美國」（鋼產）。

他的脾氣也開始變壞了，有些容不得人了，容不得不同意見者，容不得敢講真話者，1957年整了數十萬「右派」知識分子，1959年又整了數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此時毛澤東，權力極大，腦子不好，脾氣又壞。他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後果就可想而知了。不久，老人家就把剛從舊的苦難中緩了一口氣的中國老百姓又帶入新的苦難中。

1958年，毛領著人民搞「大躍進」，結果餓死幾千萬人。以河南為例，該省抗日戰爭時曾有「水旱蝗湯」四害(洪水、旱災、蝗蟲以及擾民將軍湯恩伯)之說，但這四害所造成的災難遠遠趕不上「大躍進」所帶來的災難。僅信陽一個地區所餓死的人數就達百萬人以上，超過該地區歷史上任何一次饑荒所餓死的人數，甚至超過1938年6月黃河決口淹沒豫皖蘇3省40餘縣所淹死的人數。這時的整個國家經濟不是「大躍進」，而是大衰退，不是什麼「十年趕上美國」，而是向後倒退十年。老人家執政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徹底失敗了。

「大躍進」失敗之後，毛的腦袋不發熱了，甚至，身體也因省著吃肉而缺少熱量了；脾氣也不太大了，竟能當眾做一些自我批評了。他在「七千人大會」上承認，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並承認，「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

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sup>2</sup>

在此次大會上，許多人都對中央乃至對毛本人，提出了或直接或含蓄的批評，唯獨林彪發了一通奇論，說了一番與眾不同的話。他說我們雖然在物質上損失了，但在精神上收穫了；並說我們之所以會犯錯誤，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聽毛主席的話，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sup>3</sup>。

若從事實上看，林的這番言論純屬渾話，人都不在了，還談什麼精神收穫？明明是按毛的話做才有這樣的慘禍，卻反過來說之所以有這樣的結局是因為沒聽毛的話，一派胡言亂語，似是眾人皆醒他獨醉。

若就對毛心理揣測來說，林的這番言論相當準確，即把握了多數人均未把握的毛的真實想法，並因而得著多數人均未得著的個人實惠，似又是眾人皆醉他獨醒。

對於林的發言，毛當時就予以肯定，並對總參謀長羅瑞卿說，還是林彪講話有水平，比你們這些人強。毛事後沒有忘記這位講話有水平的下級，對他寵愛有加，直至把他由黨內第六號人物提拔為第二號人物，使他坐上了副統帥位子。

對於其他人的講話，特別是對於那些隱有批評的講話，毛當時嘴上沒說什麼，但心裡耿耿於懷，並於數年後翻出這筆帳，倒算批評者。劉少奇在1962年講話中傷了毛的自尊心，到了1966年「文革」時就上了毛的大字報。後者在其「砲打司令部」中，正式提出「1962年的右傾」問題，可說是「一報還一報」。不過，兩者相報是不對稱的，劉只含蓄地說毛也有工作失誤，並繼續維護其地位；毛則公開地說劉犯了路線錯誤，並決意要將他打倒。

「大躍進」後，中國權力舞台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就是毛澤東做了一

2 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1.30)〉，《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4冊，頁1-12。

3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410-41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45-1046。

定程度的退卻，即退出國家權力的前台，坐了幾年似冷非冷的板凳。

所謂「國家權力的前台」，即國家中心工作的直接領導權，理應由國家主席承擔。當時的國家中心工作是由中共「八大」確定的經濟建設。「大躍進」的失敗已表明此事是老人家勝任不了的。另外，國家主席帽子也已在二屆人大上(1959.4)由毛澤東傳給了劉少奇。「大躍進」的失敗則使這一形式上的「傳位」有了許多實際意義。

關於毛澤東作權力退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這裡僅提及兩點：一是緣於客觀情勢所迫，二是出自主觀心理需求。

毛澤東闖了這麼大禍，或許能夠蒙蔽老百姓，或許能夠在某種「輿論導向」下使他們相信這是「七分天災，三分人禍」，但無法蒙蔽那些中央大員和封疆大吏。後者都親眼看到老人家是如何發高燒的，又是如何發脾氣的。其中許多人本身就受過他的感染，也發過類似的病，故有同病相識的真切體驗。儘管林彪在那裡發怪論，胡攪蠻纏地替毛作掩飾，但多數中央委員是心裡明白的，明白前面那句話應反過來說，即「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此「人禍」的根子正是出自他們的那位既愛發燒又愛發脾氣的老上級。劉少奇曾征詢晉冀魯豫四省首長看法，被征詢者一致認為造成「大躍進」災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為的<sup>4</sup>。顯然，像毛這種十分敏感的政治家不會不清楚這些大員們的內心想法，故不得不在他們面前表示一點歉意，作出一些退讓，退讓到甘願為他擔擔子的劉少奇的後面，做了所謂「二線人物」。

老人家自身也需要有一個心理調整時期。首先，需要從繁忙的政務中解脫出來，以鬆馳一下高度緊張的神經。其次，需要把自己折騰出來的爛攤子扔給別人，而使自己可以不直接面對那種赤地千里、餓殍遍地的景象，以減緩一下內心深處的負疚感、羞恥感。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需要靜下心來考慮許許多多問題，為下一輪政治較量積蓄思想能量。

關於毛澤東作權力退卻的結果也是多方面的，這裡也僅指出兩點：一是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頁1023。

積聚了新的政治怨氣，二是籌畫了新的政治舉措。

毛由前台退到後台本來就是不得已，就是有怨氣的。這可以從他對林彪那通怪論的肯定中看出來。他的這種怨氣在他退居後台時非但沒有消解，反而越積越多。他後來重返權力前台，對「一線」上許許多多的人和事都不滿意，說中央農村工作部「十年來沒有做一件好事」<sup>5</sup>；說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外國死人部」<sup>6</sup>；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sup>7</sup>；說中央書記處和國家計畫委員會是兩個「獨立王國」<sup>8</sup>；說「我們這個國家有1/3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掌握在敵人手裡。」<sup>9</sup> 說有不少黨政軍負責人已成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老人家有如此積怨是毫不奇怪的。由於其後任者正是在他跌倒下的地方站起來的，正是把被他折騰休克的國民經濟復蘇過來的，因而會從兩個方面觸痛他：

其一，後任者所採用的方法不同於前任者曾使用的方法，正像救人於蘇醒的方法不同於致人於昏迷的方法一樣。兩者不僅是不同的，而且是對立的，即後者對前者予以撥亂反正。這顯然不會容於老人家的胸襟，不會使他感到自在。

其二，後任者所獲得的成就反襯出前任者所遭受的失敗，反襯出他搞經濟建設時那副志大才疏的模樣。這顯然也會有損老人家的自尊心，也會叫他不得開心顏。

毛澤東在從權力前台退下來的幾年中，主要籌畫了兩件事，兩件有助於

5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526。

6 毛澤東，〈對《戲劇報》的兩次重要指示(1963.1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95。

7 毛澤東，〈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1966.3.28-30)〉，《毛澤東思想萬歲》(1962-1967)，頁405-406。

8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604。

9 同前註，頁533。

自己重返權力前台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忙著變更「八大」路線，力圖把黨的工作重心從經濟領域轉到政治領域，轉到搞階級鬥爭上——1962年9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大講階級鬥爭理論；1963年開展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挖修正主義根子；1964年開展文藝界整風運動，批「封、資、修」；1965年1月發出〈二十三條〉，決定「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965年11月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文章，揭開「文化大革命」序幕。

第二件事，就是忙著尋找一種自下而上方式來整治那些黨內「走資派」、那些「一線」上不合自己意的黨政大員，結果找到了「群眾運動」方式，找到了「文化大革命」方式，即通過發動群眾來整治他們，通過「大字報、大辯論」來批判他們，以將他們整倒、批臭。

隨著時間推移，上述兩件事逐漸由小動作變為大舉動，由次要方面升至主要方面；毛本人也由退卻轉為進擊，由後台重返前台。

毛澤東是一個很有表現慾的政治家。他雖退居後台，卻不甘寂寞，總想跳到前台來表演一番，用演藝界的話說，就是總想「搶戲」，搶其他角色的戲，尤其是搶前台主角的戲。不過，這是一種缺乏「戲德」的演技，一種讓其他角色演不下去的演技。老人家正是以此演技而讓當時居於國家權力舞台主角位置的劉少奇演不下去了，並最終讓他也活不下去了。

毛澤東還是一個很有游擊習氣的政治家。他搞不好經濟，便搞政治；在經濟上失去發言權，便到政治上大喊大叫；在經濟領域走投無路，便到政治領域另闢蹊徑。值此，我們又看到了一個游擊司令的風采：在經濟陣地上被打趴下了，便匍匐潛行到政治陣地上再爬起來衝殺回去；你打你的優勢，我打我的優勢；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此處玩不轉，另處放把火。他1934年丟了江西，1935年再謀陝北；1958年搞砸了經濟建設，1962年後又搞起一連串政治運動。

寫至此處，筆者腦中閃現出一個詞，一個曾被國民黨軍隊用「老」了的詞，叫「轉進」。如抗日戰爭初期，該軍從河北「轉進」到河南，從松滬「轉

進」到華中，最後從華中「轉進」到大西南。再如第二次國共戰爭後期，該軍又從東北「轉進」到華北，從江北「轉進」到江南，最後從大陸「轉進」到台灣島。

這個詞用在「國軍」那裡很「虛」，即只「轉」不「進」；但若用到毛澤東身上就有些「實」了，因為他既有「轉」又有「進」：在經濟上潰敗，在政治上「進」擊，左手打折了，右手又打出去了。

毛澤東在執政期間辦了兩件大事，既搞了「大躍進」，又搞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晚年在回顧自己一生所做大事時，不提前者，只提後者。後人不知他腦子裡究竟是怎樣考慮的，但可就此提出一些設想：

這是不是因為：前者已成敗局，自己已不可能再在這一方面有所作為了；後者雖最終也成敗局，但當時未分勝負，況且自己仍持主動進擊態勢；他本人又好大喜功、心高氣傲，自是不願提前者而願提後者，願提那些比較適合自己性情的東西。

這是不是因為：不提前者的潰敗，可使後者的動機顯得更純潔些，更理想主義化些。事實上就有不少人是這樣認為的，即認為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雖然結局不好，但動機是好的，是要反對官僚主義的。

我們不否認毛澤東曾是農民的兒子，曾有同情老百姓的感情，但也應看到他在大多數時間裡都是一個不斷進擊的政治家，喜於爭鬥又好於積怨。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既是要整老百姓所不滿的人，更是要整他自己所怨恨的人。

## 14

接下來的問題是，毛澤東辦這兩件大事的過程又如何呢？簡略地說，這些過程均為老人家不斷受到制約且又不斷打破制約的過程。

儘管在理論宣傳上，毛被說成一貫正確並被置於一種能制約全黨而自身不受制約的地位；但在執政實踐上，他還是受到許多制約的。其中較有分量的制約大都來自他的身邊，來自執政黨最高層。

由開國元勳組成的中共最高決策圈中，除毛本人外，幾乎所有成員都先後作出努力來阻止毛為所欲為。其中，剛正者有之，如彭德懷；敦厚者有之，如朱德；老成者有之，如陳雲；忍辱負重者有之，如周恩來……即便是因搞毛個人崇拜有功而先後被提升為「二號人物」的劉少奇和林彪也不例外。

前者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後，一度把他的頂頭上司晾於他所主持的「一線」工作之外，常常使這位「二線人物」怨聲不迭，憤怒不已。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向毛作出抗爭，並為此而丟了性命，丟了那條曾在國民黨追捕下九死一生的性命。這是他參加革命之初不曾料想的，更是他大搞毛澤東個人崇拜之初不曾料想的。在由他出演的這幕歷史劇中，前場是喜劇，後場是悲劇，全場則為黑色幽默劇。

後者林彪則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公開與毛唱對台戲，力倡設國家主席職，氣得毛斥之為：「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sup>1</sup> 林此舉，於私，可說是「搶班奪權」；於公，也可說是「維護國體」。國家主席職為國之大體，不能由著他老毛一個人想設就設，不想設就不設。會後，這位「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為了逃避可能要降於自己的「今天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571工程」紀要語）的惡運，準備與毛兵戎相見、性

1 毛澤東，〈我的一點意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26卷，頁476。

命相拚。所謂「制約」的事到了他這裡就成了「制命」的事。這位崛起於疆場、成就於戰火的中共名將，無疑有一股怒起抽刀、情急拚命的果敢精神。

這些中共高幹對這位中共主席的制約，或說這些開國元勳對這位開國君主的制約，是一波一波的，呈「潮起潮落潮又起」之勢。

就做「第一件大事」即搞經濟建設來說，毛澤東至少受到這樣一些制約：

其一，鄧子恢及中央農村工作部進言「農村合作化運動」不要搞得太快，「不要連滾帶爬地往前進」，否則，「就會要擦屁股，而且越擦越多。」<sup>2</sup>

其二，周恩來、陳雲、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聯袂「反冒進」，聲言「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sup>3</sup>，並表示要把上面的領導者的頭腦「用冷水洗洗」<sup>4</sup>。

其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不約而同地直諫「大躍進」，斥其「浮誇」不實，譏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並以道理釋之，以事實證之，諍言鯁骨，披肝瀝膽。毛澤東遇上了本黨中的人品最正且骨頭最硬的一撥人。

再就做「第二件大事」即搞「文化大革命」來說，毛澤東也多次受阻：

其一，「文革」初期，有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前有所謂「彭羅陸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黑幹將」打先鋒，後有所謂「劉鄧陶」（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黑司令部」壓陣腳，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進行了懵懵懂懂的抵制，雖無法扭轉它的根本方向，但能夠干擾它的預定進程。

其二，「文革」高潮時，有所謂「二月逆流」：既有政府副總理摔皮包、怒吼中南海，又有軍委副主席拍桌子、大鬧懷仁堂，對這場越來越亂的「文

2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頁342-345。

3 《人民日報》，1956年6月20日社論。

4 周恩來，《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1956.2.8)》，《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1。

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接受。

其三，「文革」僵持時，有所謂「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即從毛身邊的「文革左派陣營」內分出一彪人馬倒戈反叛：先在廬山上明唱「天才論」，要的是國家主席的權；後在廬山下暗發「小艦隊」，要的是毛澤東的命。

其四，「文革」後期，有所謂「右傾翻案風」。鄧小平復出前發誓「永不翻案」，掌權後仍是「死不悔改」。在周恩來總理或明或暗的支持下，在許多老幹部和廣大老百姓的期望下，再次出山的「鄧大人」又來事了，又有些故態復萌了，頻頻頂撞「文革」左派，屢屢整頓「文革」秩序，竟當著老人家的面去做他非常不喜歡的事，或損他平生最感得意的功業，或揭他老來越發生疼的爛疤。

可見，這些對毛的制約力量不能不說是很強大的，其間包括除老人家外幾乎所有中共老一代領導人，故最終置毛於眾叛親離、落孤陷寡的境地。並且，這些對毛的制約活動也不能不說是很頻繁的，其間相隔長者不過五年、相隔短者不足一年，故形成對毛輪番抗爭、節節堵擊的態勢。

然而，制約力及制約活動到頭來都失敗，都被擊破乃至被粉碎。制約者在其制約對象面前，總是處於劣勢、反受其制。在毛澤東辦「大事」過程中，其主導方面不是他如何受到這一次次制約，而是他如何打破這一次次制約。這一方節節抵抗，那一方層層突破。

文化叢刊

# 毛澤東執政春秋

2001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單少傑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張怡菁  
校對 陳怡君  
封面設計 在地研究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21-6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mailto:linkingp@ms9.hinet.net)